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考察波蘭與捷克人權及 轉型正義相關機關（構）

服務機關：行政院

姓名職稱：林明昕 政務委員

李彥賦 林明昕政務委員辦公室專門委員

石 樸 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副處長

潘 晴 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助理研究員

派赴國家：波蘭、捷克

出國期間：113年8月31日至9月9日

報告日期：113年11月29日

摘要

為汲取歐洲民主國家經驗，深入了解波蘭與捷克轉型正義運作機制，觀察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互動模式，作為臺灣轉型正義推動機制參考，並透過人權及轉型正義議題深化外交關係，本院林明昕政務委員爰率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同仁，前往波蘭與捷克考察。

本次考察在駐波蘭代表處與駐捷克代表處的協助下，順利拜會波蘭與捷克與人權及轉型正義相關的官方及民間機關（構），包括波蘭的國家記憶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IPN）、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European Network Remembrance and Solidarity）、KARTA 基金會（The KARTA Center）、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Helsinki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以及捷克的共產黨罪行調查警務局（Office for the Documentation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rimes of Communism, ÚDV）、安全部門檔案局（Security Services Archive）、極權政權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ÚSTR）、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Platform of European Memory and Conscience）、戰後（Post Bellum）。

本文將逐一介紹各拜會機關（構），透過拜會紀要呈現波蘭與捷克的不同官方機關、國際組織及民間團體對轉型正義相關政策推動經驗之分享或建議，並介紹其他具轉型正義教育推廣意義之博物館、紀念館與公共藝術地景，最後依考察心得觀察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反饋於臺灣轉型正義整體推動工程，深化民主人權根基。

目次

第一章 考察緣起與行程說明.....	1
第一節 考察緣起.....	1
第二節 行程說明.....	1
第二章 拜會波蘭人權及轉型正義相關機關（構）.....	4
第一節 拜會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	4
第二節 拜會國家記憶研究院.....	10
第三節 拜會 KARTA 基金會.....	18
第四節 拜會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	23
第五節 參訪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	28
第六節 參訪華沙起義博物館.....	30
第三章 拜會捷克人權及轉型正義相關機關（構）.....	34
第一節 拜會共產黨罪行調查警務局.....	34
第二節 拜會安全部門檔案局、極權政權研究中心、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	39
第三節 拜會「戰後」.....	48
第四節 參訪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雕像、米拉達·霍拉科娃紀念碑、絆腳石、藍儂牆.....	53
第五節 參訪共產主義博物館.....	56
第六節 參訪利迪策紀念館.....	65
第四章 心得及建議.....	74
第一節 汲取歐洲經驗精進轉型正義推動方向.....	74
第二節 以民主人權價值作為外交軟實力.....	79

第一章 考察緣起與行程說明

第一節 考察緣起

許多中歐國家先後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的人權侵害及冷戰時期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並於 1980 至 1990 年代開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其面對困難歷史、推動轉型正義之相關政策經驗，值得我國借鏡。爰由本院林明昕政務委員，率李彥賦專門委員、人權及轉型正義處石樸副處長及潘晴助理研究員，前往波蘭與捷克進行考察。考察重點如下：

一、深入了解波蘭與捷克轉型正義運作機制

透過參訪人權及轉型正義相關機構，了解其推行轉型正義經驗，包括立法、政策制定及執行等方面的具體措施。可借鏡其成功的經驗，制定更適合臺灣的轉型正義推動機制，同時識別其運作中的挑戰與不足，避免重蹈覆轍。

二、觀察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互動模式

觀察並分析波蘭與捷克推動轉型正義過程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互動模式，並了解民間對政府轉型正義政策的批評與建議，避免單一視角帶來的侷限。盼為臺灣下階段建立推動轉型正義的公私協力介面平臺提供參考，確保政策更能符合社會各界的期待與需求。

三、實質增進雙方外交關係

通過正式拜會和交流活動，深化與捷克和波蘭之間的雙邊關係，特別是在轉型正義、人權保障及民主發展等方面的國際交流，為未來長遠合作關係奠定基礎。

第二節 行程說明

此次考察，承蒙駐波蘭代表處與駐捷克代表處的鼎力協助，共順利接洽到 9 個官方及民間機關（構），考察行程詳見下表。

在波蘭之拜會機關(構)包含官方機關「國家記憶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IPN)、國際組織「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European Network

Remembrance and Solidarity)、民間團體「KARTA 基金會」(The KARTA Center) 及「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Helsinki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在捷克之拜會機關(構)包含官方機關「共產黨罪行調查警務局」(Office for the Documentation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rimes of Communism, ÚDV)、「安全部門檔案局」(Security Services Archive)、「極權政權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ÚSTR)、國際組織「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Platform of European Memory and Conscience)及民間團體「戰後」(Post Bellum)。

除了拜會官方機關、國際組織及民間團體，訪團也利用拜會空檔參訪具轉型正義教育推廣意義之博物館、紀念館與公共藝術地景，作為我國推動相關業務參考。在波蘭參訪華沙起義博物館(Warsaw Rising Museum)、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Ghetto Heroes)、「華沙之跪」地點；在捷克則參訪共產主義博物館(Museum of Communism)、利迪策紀念館(Lidice Memorial)、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雕像(Memorial to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米拉達·霍拉科娃紀念碑(Pomník Milady Horákové)、絆腳石(Stolpersteine)、藍儂牆(Lennon Wall)等。

考察行程表

日期	時間	行程
8/31 (六)	晚上	訪團自桃園機場搭機赴捷克
9/1 (日)	上午	抵達捷克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維爾機場
	全天	參訪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雕像(Memorial to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米拉達·霍拉科娃紀念碑(Pomník Milady Horákové)、絆腳石(Stolpersteine)、藍儂牆(Lennon Wall)
	晚上	訪團自捷克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維爾機場搭機赴波蘭
9/2 (一)	上午	拜會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European Network Remembrance and Solidarity)
	下午	拜會國家記憶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IPN)
	傍晚	參訪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Ghetto Heroes)、「華沙之跪」地點
9/3 (二)	上午	拜會 KARTA 基金會(The KARTA Center)
	下午	拜會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Helsinki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9/4 (三)	上午	參訪華沙起義博物館 (Warsaw Rising Museum)
	中午	訪團與駐波蘭代表處胡副代表韻芳餐敘
	下午	訪團自波蘭華沙蕭邦機場搭機赴捷克
9/5 (四)	上午	拜會共產黨罪行調查警務局 (Office for the Documentation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rimes of Communism, ÚDV)
	下午	整備拜會及參訪資料
9/6 (五)	上午	拜會安全部門檔案局 (Security Services Archive)、極權政 權研究中心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ÚSTR)、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 (Platform of European Memory and Conscience)
	下午	拜會戰後 (Post Bellum)
9/7 (六)	上午	參訪共產主義博物館 (Museum of Communism)
	中午	訪團與駐捷克代表處柯良叡大使餐敘
	下午	參訪利迪策紀念館 (Lidice Memorial)
9/8 (日)	上午	訪團自捷克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維爾機場搭機
9/9 (一)	上午	訪團抵達桃園機場

第二章 拜會波蘭人權及轉型正義相關機關（構）

第一節 拜會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

- 拜會時間：113 年 9 月 2 日 星期一 上午 10:00
- 接待人：主任 Rafał Rogulski、副主任 Iga Raczyńska、波蘭召集人 Jan Rydel、首席策略與發展專家 Marianna Sadownik
- 機構簡介

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是由德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等歐盟國家的文化部長，於 2005 年倡議成立，並且把主要辦公室設立在華沙。¹該組織是一個專注於極權統治和轉型正義議題的國際性研究網絡，主要職責包括舉辦國際研討會與促進跨國交流，並聚焦於多項關鍵議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影響、強迫遷徙、極權體制的影響，以及與轉型正義相關的研究與討論。現有來自 40 個國家、超過 500 個官方及民間夥伴。

作為一個國際組織，其組織會員是國家，經費也來自國家。於 2005 年由波蘭、德國、斯洛伐克、匈牙利所發起，之後羅馬尼亞也加入發起。這些國家的歷史都很不太一樣，從共產走到民主化的歷程也不盡相同。這些主要創辦的會員國共同資助該組織的運作，亦有投票權。而除了主要創辦的會員國，也有一些是觀察會員國。觀察會員國沒有出錢資助，沒有投票權，但他們也會提供建議；包括奧地利、捷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阿爾巴尼亞、喬治亞。

- 拜會紀要

一、「歷史知識」是轉型正義基礎，以促進「歷史對話」為任務宗旨

該組織認為轉型正義工作的基礎是對話。歐洲面對的議題很複雜，不只是二十世紀，還有之前的殖民主義留下的犯行。該組織主要處理的是納粹和共產極權主義，但是也處理其他的威權議題，如西班牙的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該組織的網絡有很多歐洲國家，每個國家有各自的議題，但也有一些共同的議題。

¹ European Network Remembrance and Solidarity, “A brief history of the ENRS”. <https://enrs.eu/en/a-brief-history-of-the-enrs>

每個國家經歷納粹和共產極權主義的程度都不同，而每個國家面對自己歷史的態度也不同，因此，該組織致力尋找對話的可能。他們相信，關於二十世紀歷史的知識是不可或缺的，有了這些基礎資訊，轉型正義才能運作。2010年，該組織在籌備五年後，有了第一次的會談，但卻遇上了悲劇：兩位創辦人 Andrzej Przewoźnik 和 Tomasz Merta（當時波蘭文化部次長）為了出席歷史真相和轉型正義的活動前往斯摩棱斯克（Smoleńsk），但在空難中不幸喪生²。

二、各國歷史經驗不同，推動交流合作有助完整還原歷史真相

該組織強調歐洲的轉型正義很複雜，1989年共產獨裁統治結束後，每個經歷過共產統治的國家，都試圖面對過去的歷史，撫平過去的傷痛，帶來新的正義。然而，每個國家面對的方式都不同。第一個開始做轉型正義的是德國，東西德統一後，曾受史塔西（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壓迫的受害者要求正義，所以德國是第一個去處理這個問題的，也成立了相關的機構；但德國能夠這麼做，是因為之前就有兩個德國；在東德存在的時候，還有一個民主的西德。所以他們可以很快地把東德政治圈、學術圈或司法圈的人換下來，換一批新的人上去。

德國的經驗，在其他的國家並不一定能夠做到。就波蘭來說，原本共產時代在政治、學術、司法圈有影響力的人，在民主化後依然對新的現實有影響力。處理自己的威權統治過去，是比處理另一個國家的威權統治過去，來得困難許多；某種程度上，這些其他國家的狀況，和臺灣比較像。但是他們也補充，德國面對過去歷史和轉型正義不像大家所想的這麼理想，以奧斯維辛集中營來說，加害者實際上在法庭上受到處罰的人少於10%；也就是說，90%以上的人沒有為他們所做的事受到任何處罰，其他國家集中營的情況也是這樣。

以波蘭經驗來說，波蘭的歷史有共產主義也有納粹。波蘭在二十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再次獲得獨立，但在1939年德國和蘇聯入侵後，又失去獨立。二戰結束後，德軍走了，卻成為蘇聯統治下的波蘭人民共和國。1989年才結束共產時期，直到這時才能去談論、真正去清理、面對二戰時期德國和蘇聯的暴行；因為

² 2010年4月10日，一架載著波蘭總統列赫·卡辛斯基和眾多政府高官的專機在俄羅斯斯摩棱斯克發生空難，意外墜毀。這些人本來是要去參加紀念卡廷大屠殺（Katyn massacre）七十週年紀念的活動，卡廷大屠殺是二戰期間俄羅斯對波蘭人（主要是軍官）進行屠殺的事件，犧牲者超過兩萬名。

不是每件事在共產時代都可以談論。

波蘭的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工程會和鄰近其他的國家有關，比如說和德國（在處理納粹歷史的時候），以及俄羅斯（處理共產主義、蘇聯的歷史的時候），因此，對於各國歷史的了解變得十分重要；這對波蘭人如何看待自己和自己的歷史，有很大的影響。在 1999 到 2000 年間，波蘭曾經和德國的合作，在合作過程中發現，關於二戰的歷史，他們對彼此的觀點的瞭解都很有有限。至於和俄羅斯交流的情況，就比較不順暢；曾經有一段時間，波蘭和俄國都成立了機構，讓雙方可以對話，但是俄羅斯的機構很快就消失了，後來他們也拿不到俄羅斯的檔案。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和俄國的對話、交流也變得更加困難。

三、威權的影響持續存在，有礙轉型正義工作推動

1989 年之後，波蘭原執政黨—波蘭統一工人黨（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雖然解散，但其成員並未退出政治舞臺，而是組建了新的政黨。隨後，這個政黨又經歷了分裂和改組，一部分成員轉向自由的左派聯盟，另一部分則投身於右派政黨。換言之，原共產政權的核心人物仍然在波蘭政壇發揮著重要影響力。

波蘭人民的想法可以分成三種：第一種是和過去威權政權、官方媒體有關的人和他們的家人，他們反對任何清理。這和波蘭民主化的特殊過程有關，波蘭的民主化是和平的過程，圓桌會議是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和反共人士的共識下進行的。所以，對許多之前在舊體制的人來說，他們覺得波蘭的民主化是個很自然發展的過程，甚至還會把波蘭民主化歸功於己，其中有些人也不認為他們之前做過什麼壞事。第二種是堅決反對共產政權的人，認為清理過去、追訴加害者、賠償受難者是必要的。第三種人則介於中間，認為有清理的必要，但不必徹底除垢。

波蘭在民主化、反共派執政幾年後，後共產主義者就以民主政黨的姿態回到政壇，成為執政黨了。之後，這些人有些在北約，有些在歐洲議會……不管波蘭內部政壇如何變化，這些人還是很有影響力。波蘭的投票率很低，大概在 40%到 60%之間，因為選民成長在共產時代，當時的選舉缺乏公平性可言，所以很多反共人士會把「不投票」當成一種抵抗行動。波蘭的政治生態，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民主化後前十年，大家都堅決反共，不和以前舊體制的人合作（雖然這些舊

體制的人也成立了自己的政黨)，但是十年後，波蘭兩大黨—公民綱領黨(Platform Obywatelski)及法律及正義黨(Pis i Sprawiedliwość)都邀請、吸收了以前舊體制的人士。所以，這樣的組成，也形塑了波蘭今日的政治生態。左派聯盟很反對清理歷史，也反對開放檔案，甚至說「要把那些檔案用水泥封起來」(zalenie betonu)。但後來檔案在波蘭民主化十年後開放了，現在這些檔案由國家記憶研究院保管，他們會決定檔案可以開放給誰看，以及如何開放。他們也有起訴加害者的功能，這樣的融合是很特殊的。

四、對臺灣的觀察與建議

該組織指出，西班牙的轉型正義經驗與臺灣較相似，值得臺灣參考。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的政權在 1970 年代垮臺，當時許多人認為應該要忘掉過去、發展經濟。只是他們後來發現這是錯的，所以中間派和左派就開始推動轉型正義的工作，把佛朗哥的屍體移出紀念館，移到別的地方下葬。同時，也開始做社會對話溝通、民主記憶、辨識加害者、紀念受害者的工作；這和臺灣所處的階段很類似。在巴塞隆納，有一個平臺叫 Eurom³，專門處理西班牙和歐洲的民主化歷史。不過，該組織也表示，不管是 Eurom 或是捷克的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Platform of European Memory and Conscience)，安排的活動都沒有像該組織這麼多，主要肇因於經費不足。而該組織的經費是來自國家，較為充足，所以可以辦很多活動，涵蓋學術研討會，教育推廣，到給年輕人的工作坊等。

該組織舉辦的活動多屬國際性，總是會有兩個以上的國家機構參與，教育活動也是如此，會和國外的學校以及國際的青年組織合作。該組織有一個二十世紀歷史的教育網站，有七國語言（但不是所有資料都有七國語言，主要還是英文和波蘭文），提供學校教師與年輕學子適合的歷史教材。另有許多互動的設施，有動畫和電影，還有針對二十世紀歷史議題的教案。此外，除了回顧和學習過去的歷史，還將探討多元議題，並教授年輕人批判性思考的技巧，例如如何辨識假新聞，以及如何應對當前歐洲所面臨的各種挑戰。至於在教育素材的準備方面，該組織首先會問老師在教學上需要什麼，是否會使用該組織的網站以及如何使用，然後再根據他們的需要來修改網站內容、準備素材。該組織也建立了一個教師的

³ 全名為 European Observatory on Memories，網址：<https://europeanmemories.net/>

社群網絡，使教師可以找到需要的工具和方法。

最後，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表示很樂意用各種形式和臺灣建立長期的交流合作關係，持續發展雙方對話。

● 拜會小結

作為研究極權統治以及轉型正義相關議題的國際網絡，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強調歐洲轉型正義的經驗十分複雜，各國面對的議題和抱持的態度不盡相同，舉例來說，德國經驗有其歷史條件的特殊性，是其他國家難以複製的，而德國的轉型正義也不像多數人以為的那麼理想，尚有許多未竟之處；以波蘭經驗來說，儘管在民主化後原本執政的共產黨瓦解了，但過去共產政權人士仍被吸納進入新組織的政黨，在政壇上還是具有影響力。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也提到，比起其他許多歐洲國家面對的納粹及共產極權統治歷史，西班牙經歷佛朗哥威權統治的經驗與轉型正義進程跟臺灣更加相似，可作為我國參考。

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認為歷史知識是推動轉型正義的基礎，因此致力進行教育推廣活動，尤其是針對年輕人及教師社群。訪團提到我國的國家人權博物館也會設計教案和歷史教育的素材讓教師使用，並進行許多人權及轉型正義的教育推廣活動，因此詢問該組織未來有沒有可能與臺灣進行交流合作，例如針對年輕世代的教育或是人才的駐地交流等。對方也表示非常樂意與臺灣持續對話，認為雙方可多參與彼此所舉辦活動，深化雙邊互動關係。



2024.09.02 訪團拜會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



European Network Remembrance and Solidarity

9月2日下午8:15 · 🌐

👉 Today we hosted representatives from Taiwan's Department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secretary of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They shared Taiwan's journey towards addressing historical injustices and promoting human rights with us.



! Following World War II, Taiwan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political unrest under the Kuomintang (KMT) government, this period of omnipresent control of society and authoritarian power is known as the White Terror. Many victims of political persecution lost their lives, others were imprisoned and their property confiscated during this time.

🗣️ Today, Taiwan is committed to uncovering the truth, providing reparations, and preventing future injustices. The Department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established in 2022, coordinates efforts across various ministries to ensure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Key initiatives include declassify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prosecuting human rights violators, and supporting victims of past political persecution. 🗨️

🗣️ During our meeting, we also discussed Europe's experience with its authoritarian past, ways to engage younger generations in historical educa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 Taiwan's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s a powerful example of how nations can work towards restoring and unkeening democracy.

👉 We greatly appreciate the insightful dialogu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potential collaborations, particularly in engaging young people and addressing the legacies of authoritarianism in both Europe and Asia. 🌍🌍



2024.09.02 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臉書粉絲專頁發布之拜會紀錄

第二節 拜會國家記憶研究院

- **拜會時間：**113 年 9 月 2 日 星期一 下午 14:00
- **接待人：**副所長 Karol Polejowski、檔案館副主任 Mariusz Żuławnik、紀念殉難者辦公室主任 Adam Siwek、人事審查辦公室副主任 Artur Stawiarski、反波蘭民族罪刑起訴委員會檢察官 Bogusław Czerwiński
- **機構簡介**

國家記憶研究院由波蘭國會根據 1998 年 12 月 18 日通過的《國家記憶研究院法》成立，院長由議會選出，該機構兼具行政及司法機關的功能，同時進行學術研究及教育工作。機構有獨立經費，於 2000 年正式開始運作，主要工作包含處理納粹及前共產黨執政時期安全部門留下的檔案資料、人事清查與除垢、搜尋與紀念受難者、歷史研究與教育推廣等。該機構下設置之單位，包含反波蘭民族罪行起訴委員會、人事審查辦公室、紀念殉難者辦公室、搜尋與身份辨識辦公室、國家教育辦公室、歷史研究辦公室、檔案館、出版社等。除了在波蘭華沙的總部，在其他城市也有十幾個分部，總共有約 2,500 名員工。

- **拜會紀要**

一、雖以獨立專責機關主辦轉型正義，但各政黨仍有其影響力

不同於臺灣的轉型正義推動工作，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解散後，分散由六部會主責，波蘭則採取較為集中的做法，由國家記憶研究院綜理各項轉型正義推動工作。研究院表示，這種模式的優點是「獨立性」。研究院的院長是由議會選出，任期五年，只對國家記憶研究院的學院負責⁴，因此不易受其他的部會影響，也不易受外在的政治勢力干涉。研究院認為這樣的作法很成功，因為這讓機構的運作有持續性，不會受到政黨輪替的影響，也因此有獨立的經費，可自行決定要怎麼使用這些經費。

不過，研究院也坦承，既然院長是議會選出來的，人選自然也是經過各政黨勢力協商後的結果；這意味著各政黨間的妥協仍是必要的。現任院長 Karol

⁴ 此處所指的學院類似我國本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

Nawrocki 於 2021 年被選出來的時候，執政黨在眾議院占有多數席次⁵，但在參議院則是少數。即使如此，他還是被所有人推舉出來。然而這不包括後共產的勢力——他們從一開始就反對國家記憶研究院的存在，覺得國家記憶研究院應該被廢除，不過這樣的勢力在國會中席次太少，影響力並不大。雖然國家記憶研究院是一個獨立機構，不受其他部會管控，但因為工作的性質，仍需和其他政府機關密切合作，像國際合作就要仰賴外交部，研究院的起訴部門也會和司法單位合作。和其他部會的合作，就會受到政黨輪替的影響，因為並不是所有的政黨都接受研究院所做的事。

二、檔案徵集以共產時期軍、警、情治機關為重點，並作為辨識加害者之證據

有關檔案的徵集，研究院表示，波蘭從 2000 年末開始檔案徵集。根據國家記憶研究院法，相關部會要將其在 1944 至 1990 年間的民事及軍事檔案移交給研究院。研究院強調，並不是他們去請求部會交出檔案，而是根據法律規定，部會有義務要這麼做。徵集的時間花了兩、三年，到了 2003 年已經搜集到大部分的檔案。這些檔案的來源包含：內政部國安局、警察部門、各部會（司法、內政、國防）。除了政府部門的檔案，研究院也會徵集私人的檔案，或是從進行歷史記憶研究的國內外民間機構徵集檔案。

訪團進一步詢問研究院是否會徵集政黨的檔案？對方表示，研究院並沒有管理這類檔案；如果是關於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檔案，是在新檔案局（Archiwum Akt Nowy）⁶，或是其他檔案機關中。研究院主要關注的是波蘭共產時期的軍、警、情治檔案。他們也提到，如果有歷史學者想要研究波蘭的共產時期，應該同時運用參考研究院的檔案，也該運用其他國家檔案機構的檔案，這樣看到的圖像會比較完整。幾年前，歷史學家會遠遠避開國家記憶研究院的檔案，但如果不用研究院的檔案，是沒辦法做徹底的研究的；現在情形已有改變。

至於檔案的使用和瀏覽，並不是所有人都能來看研究院的檔案，法律中有明文規定誰可以看檔案，其中包括研究者、記者、國家記憶研究院的員工、有獲得

⁵ 執政黨係指法律及正義黨。

⁶ 新檔案局創立於 1919 年，是波蘭三大國家檔案保存機構之一，另外兩個是創立於 1955 年、收藏影音資料的國家數位檔案局（Narodowego Archiwum Cyfrowego）和創立於 1808 年的老檔案局（Archiwum Główne Akt Dawnych）。

授權的機關（部會、警察部門、總統府），以及部分個人（受害者本人，或如果本人已經過世，家人可以申請）。另外，每個波蘭的公民都可以向研究院提出申請，瀏覽過去的特務或是現在的高官的檔案。除了較為隱私的資訊（疾病、性傾向、宗教信仰）不提供，其他的資訊都會提供。不過，就像其他國家檔案機構一樣，研究院不會提供檔案的研究分析，也不會評斷檔案的內容是真是假；至於判別內容的真假、如何利用這些看到的資料，是申請人要負的責任。

另外，研究院也有做除垢的名單。所有在 1972 年以前出生的人，如果想要擔任公職，都要提出自己沒有在共產時代和秘密警察合作的聲明。之後，研究院會去調查其證詞是否屬實。研究院指出，在極權統治之下受害情況多元，有些人受到監控，有些人因告密而受害……。研究院認為，共產體制的真相與構成體制的個人之真相密不可分，如果有受害者，必然也存在加害者及協力者，而受害者及公眾有權知悉曾與秘密警察合作的人究竟是誰；沒有公開真相，就沒有和解。儘管共產體制瓦解三十幾年後，這些反共的不滿情緒已經比較緩和了，但依然存在。研究院認為，相關的歷史資訊都必須公開。當然，每個人都有機會在除垢法庭前為自己辯護，法庭也會去查驗檔案確認其陳述的真實性。

研究院進一步補充，當他們對檔案的真實性有疑慮，就會去調查檔案的真實性，例如鑑定筆跡以及紙張是不是那個時代的。其中一個案例是關於波蘭民主化後首位民選總統華勒沙（Lech Wałęsa）的檔案。華勒沙被指控，在 1970 年代（團結工聯運動之前）曾是內政部國安局的線人。華勒沙公開反駁，表示自己不是文件中提到的線人，質疑文件的真實性。因此，研究院對文件做了很詳細的研究，研究結果指出，紙張是 1970 年代的，而筆跡也是華勒沙的親筆簽名，表示其在 1970 年代確實曾是線民。⁷另一個例子，是關於一件納粹時期的罪行；因為能夠出面指認的證人都過世了，所以唯一可用來指證那人確實有犯行的，是他的軍餉單據。研究院也做筆跡鑑定，確認是不是那個人簽的。至於這些調查是研究院主動調查，還是接受他人申請來進行調查？研究院則稱視情況而定，如果在偵查中沒人質疑文件的真實性，就不會去做查證，但如果有人質疑就會去查證。

⁷ 在參訪赫爾辛基基金會時，該基金會則表示，這是一項蠻橫的指控，因為法庭並沒有讓華勒沙本人有反駁的機會。

三、視極權政權犯行為危害人類罪，故無追溯時效問題

有關波蘭追訴過去極權政權犯行是否有法律追訴期的問題，研究院表示，依據國家記憶研究院法規定，納粹時期和共產時代的犯行是危害人類罪，因此沒有追訴期時效的問題。研究院進一步說明，他們所追訴的罪行，是在當時的法律下，也屬於違法的罪行，例如刑求，在極權政權下也是違法的；沒有證據或根據偽造的證據去起訴一個人，在當時也是違法的。研究院必須去證明，確實有發生這些違反當時法律的事，只有這些事能夠追究。而這類事件其實很多，因為當時的共產主義者也違反了他們自己立下的法律，只是這些違法行為在當時無法被追究、懲罰，因為當時的體制保護了這些人。舉例來說，在 1982 年波蘭戒嚴時期，有一群反共主義者被共產政權關在監獄裡，並在監獄裡被刑求、毆打。在那個時候，虐囚也是一種犯行；現在研究院可以對那些獄警進行起訴。這也是為什麼在進行起訴的部門中，也需要有了解當時法律的歷史學家，因為歷史學家可以判斷這些行為在當時是否符合當時的法律。

四、找尋受難遺址及遺骸，創傷療癒工作回歸家庭

研究院自 2016 年起，就會去維護、保存不義遺址和重要歷史的遺跡，也會設置犧牲者的紀念雕像。這包括關於事件的記憶，以及墓地的保存、修建，也包括其他國家在波蘭的重要歷史記憶地點，以及波蘭在其他國家的重要歷史記憶地點。地方的自治政府或民間組織可以向研究院提出申請，要求保存某個遺址、修墳墓、蓋紀念碑／紀念牌，而研究院可以提供經費讓他們去做這些事。

由於臺灣目前有進行政治暴力受害者及家屬的創傷療癒工作，訪團也好奇國家記憶研究院是否會提供受害者相關創傷療癒或心理諮商服務？對此，研究院表示，政治暴力已是數十年前的事情，根據法律，他們沒有義務提供受害者創傷療癒服務，並認為家庭的支持就是最好的療癒。但研究院也提到，他們在波蘭北部有發現百名受害者的遺骸，儘管這些人是 80 年前的受害者，但他們找到這些犧牲者埋葬的地方，把骸骨挖出來，用 DNA 辨識其身分，協助家屬認領。同時，也安排一個隆重的儀式，把這些人的身份證明和骸骨交給家屬，使家屬確定骸骨確實是屬於他們的先人；這也有很重要的轉型正義意義。獲得遺骸後，家人就可以好好將祖先安葬，這對波蘭人來說很重要。

五、與民間合作有限，以教育作為主要合作範疇

在與民間機構的合作方面，研究院很樂意和各種民間單位合作，但國家記憶研究法很清楚地訂定了研究院應該做的工作，並不是所有的民間機構都符合和其合作的條件；有進行合作者，主要是關於記憶保存、轉型正義的機構。研究院很重視教育的工作，在教育方面廣泛和民間機構合作，同時也設有獎項頒發給這些機構，例如有一個獎是頒發給在國外推廣波蘭歷史教育的機構或個人。另外，也會和受到共產主義壓迫的反共運動者合作。研究院和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以及其他一些國際組織也有合作，也是成員，不過他們和這些不同機構的合作及參與程度都不同，在其中的地位也是比較特別，因為研究院不是民間組織，而是國家機構。

六、立有清除威權象徵專法，推展初期頗有成效，後期則仍受政治力影響

有關波蘭如何處理共產時代留下來的威權象徵、建築物、雕像或是路名？在波蘭憲法中有規定，禁止用建築物、路名、雕像去歌頌極權主義人物或體制。因此，所有和極權主義有關的象徵，都必須從公共空間中移除，包括路名、廣場、雕像、紀念牌等。而波蘭的去共工作，依據的法律是 2016 年的《去共法》⁸。這個法提到了移除這些共產象徵物的義務，但沒有提到如果沒有移除，會有什麼懲罰。去共工作推行的初期，進展算是迅速的，但後來慢了下來；有些地方自治政府沒有完成義務，或是做得不情不願；那些不情願的地方政府，多半和左派的後共政黨勢力有關。2022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國家記憶研究院提出呼籲，要把公共空間的共產象徵移除，當時研究院盤點在波蘭還留存有 60 個和蘇聯有關的空間，目前與地方自治政府合作下已去除了 40 個。不過，有些地方政府也會做「復共」(re-komunizacja) 的行動，比如把已經去掉的共產象徵回復到公共空間，不過這是極少的案例。而這些去共的行動，是受到俄羅斯反對的，因此，國家記憶研究院也在俄羅斯的黑名單上。

最後訪團提問，史達林送給波蘭的科學文化宮 (Pałac Kultury i Nauki) 是否也是波蘭去共的對象之一？研究院回覆，這棟建築物是蘇聯統治波蘭的象徵，

⁸ 《去共法》全名為《禁止透過鄉鎮市區組織單位、鄉鎮市區協助單位、建築結構、雜項工作物、公眾使用設施名稱及紀念建築物宣傳共產主義或其他極權主義法》。

1990 年代有討論過要用什麼方式把它覆蓋或遮擋起來，但這個想法沒有實現；另一種去共的方式是改變建築物的功用，像波蘭原本有一些建築物是屬於共產黨的，但民主化之後就把它們拿來作別的用處。

● 拜會小結

國家記憶研究院作為波蘭官方專責轉型正義之多功能獨立機構，定位特殊，推動的業務範圍廣泛，主要根據相關政治檔案，去進行起訴、查證、教育、保存不義遺址、去除共產象徵、紀念犧牲者並尋找其遺骸、國際合作等工作，他們對於年輕人的教育相當重視，也會透過自己開發電玩、舉辦文化活動等方式吸引年輕族群的興趣。

雖然國家記憶研究院相當強調自身作為獨立機構的獨立性，但由於院長係由議會各政黨協商選出，因此仍多少會受到政治力影響。但整體而言，並不會因為政黨輪替影響轉型正義工作的持續性。不過，研究院也提到有些政策會因地方政府不配合而難以推動，如去共的過程，這部分與臺灣在處置威權象徵時面臨的困境十分類似。

比較特別的是波蘭進行人事除垢與追訴加害者的經驗分享。國家記憶研究院強調，先公開真相才有和解的可能，想擔任公職的人都要提出自己沒有在共產時代和秘密警察合作的聲明，並接受調查。在臺灣談到追訴威權統治時期加害者時，時常引發法律追訴期的爭議，然而，波蘭認為納粹及共產時期的罪行屬於危害人類罪，因此沒有追訴期的問題。研究院也強調其所追訴的罪行，是在當時的法律下亦屬違法的罪行，並無「以今非古」的問題。

另外，藉由此次拜會，訪團也發現在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的部份，臺灣其實走得比波蘭更前面。相較於國家記憶研究院認為照顧療癒的功能應由家庭承擔，我國則由衛生福利部主責進行整體性的政治暴力受難者照顧療癒規劃，或可作為與國際分享臺灣推動轉型正義特殊經驗的亮點之一。



2024.09.02 訪團拜會國家記憶研究院

06.09.2024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visited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 2 September 2024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visited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 2 September 2024; photo: S. Bardski (IPN)

Four members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al cabinet (Executive Yuan) and the Secretary of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Poland met with IPN Directors headed by the Deputy President Prof. Karol Polejowski. A two hour discussion focused on exchang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ructure, tasks and activities of the IPN.

During the meeting Prof. Karol Polejowski outlined some aspects related to the Institute's structure and activities. Referring to the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land, Prof. Polejowski underlined that it is our duty to search for and to identify the communist's victims in order to return them to their families.

Communism has plowed through our society, but has not captured the minds of Poles, said Prof. Karol Polejowski

The IPN Archive Deputy Director Mariusz Żuławnik, Ph.D. explained procedures of collecting, preserving and making available the archival files while the IPN Prosecutor Bogusław Czerwiński gave an insight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ocuments authenticity for investigation purposes.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for Commemorating the Struggle and Martyrdom Adam Siwek, Ph.D. shared his experience about commemoration of the memorial sites and the process of decommunization of public space in Poland and the Vetting Office Deputy Director

Artur Napióra focused on the challenges related to former communist activists who applied for public service jobs.

The meeting was organized by the IP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 was emphasized that from its onset the IPN had been the mentoring institution,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the issues related to transitional justice were tackled by the Transitional Justice Commission which was an independent government agency of Taiwan active from 31 May 2018 to 30 May 2022 based on the Act on Promoting Transitional Justice. The commission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actions taken by the Kuomintang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between 15 August 1945 and 6 November 1992. The commission's main aims included making political archives more readily available, removing authoritarian symbols, redressing judicial injustice, and producing a report on the history of the period which delineates steps to further promote transitional justice. A new Department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was launch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on 27 June 2022 in Taipei City to continue to promote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2024.09.06 國家記憶研究院官網發布之拜會紀錄

第三節 拜會 KARTA 基金會

- 拜會時間：113 年 9 月 3 日 星期二 上午 10:00
- 接待人：共同創辦人暨教育與創新部長 Alicja Wancercz-Gluza、編輯 Justyna Avci
- 機構簡介

KARTA 基金會是一個致力於收藏史料和推廣歷史的波蘭非政府公益組織。該基金會成立於 1982 年波蘭戒嚴期間，起初以地下反抗運動刊物「KARTA」推動公民社會對公共議題的關注與討論。自 1987 年起，KARTA 的編輯團隊開始積極收藏共產黨統治相關的歷史資料，同時投入書籍和刊物的出版工作，逐步建立起一個重要的歷史資料保存和研究平臺。

- 拜會紀要

一、各類豐富館藏史料，見證波蘭民主奮鬥史

在座談開始前，KARTA 基金會共同創辦人先帶訪團到基金會的地下室介紹他們豐富的館藏，包括 KARTA 以及其他民間組織在共產黨統治時代所發行的地下刊物。他們有多達 3,500 種來自全國不同城市的刊物，KARTA 認為這些地下刊物象徵人們對言論自由的渴望，集結了反抗運動的意志，終使極權政府垮臺。除此之外，他們也蒐集團結工聯運動的相關史料、反抗運動者如亞采克·庫倫（Jacek Kuroń）或亞當·米赫尼克（Adam Michnik）所捐的史料、以及其他從民間徵集到的珍稀或不為人知的文物和照片等，人們會帶著裝滿史料的皮箱來捐給他們。KARTA 有 50 萬張照片，大部分有數位化，可以線上查閱。KARTA 也會開放紙本檔案讓民眾在閱覽室閱覽。

KARTA 介紹了當時人們如何印製和發行地下刊物，並展示了運動者為募資而推出的郵票，以及印有地下反抗運動口號的紙鈔。當時，地下反抗運動者會在紙鈔上蓋上「我們要撐下去」、「我們要繼續戰鬥」等激勵人心的字句，讓這些紙鈔在市場上流通。目的在於激勵人們，透過紙鈔傳遞勇氣，讓看到的人能夠堅持下去。這種私人、微小的反抗行動其實在二戰時就存在，當時進行這種行動可能

會因此被處死刑。

訪團提及臺灣在威權統治時代也有一些地下刊物，其中像是《自由時代》的總編輯鄭南榕先生，也是為追求言論自由，後來自焚犧牲，而他逝去的 4 月 7 日被訂為言論自由日。KARTA 表示在波蘭與捷克也有過這樣的犧牲者，捷克曾有一位自焚者 Jan Palach⁹。而在民主時代的波蘭，也有一個人在 2017 年為了反抗法律及正義黨政府，在華沙市中心自焚¹⁰。

二、所藏史料可作為地下反抗運動者申請賠償之證明

由於 KARTA 收藏的團結工聯運動的相關史料非常珍貴，2004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曾頒發感謝證予 KARTA。此外，對於共產時代的地下反抗運動者而言，這些史料具有重要價值。在向政府申請賠償時，地下反抗運動者需要證明自己曾經參與地下工作並遭受壓迫，這時 KARTA 蒐集的史料就成了關鍵資料。KARTA 甚至會提供相關證明書，協助申請人完成賠償手續。同時，申請者還會使用國家記憶研究院的檔案，因為該研究院的紀錄涵蓋審訊和判決內容，而 KARTA 的檔案則著重於記錄地下運動者的具體行動。儘管如此，KARTA 指出，這項賠償金額並不高，每月僅有 400 波蘭幣（約 100 美元），並納入退休俸中，且這項制度也只是最近才得以實施。

三、認為國家記憶研究院之工作推動難免受政治力影響，期盼政府採納民間意見

訪團詢問 KARTA，從民間角度如何評價波蘭官方的轉型正義推動機制？KARTA 表示，基金會的存在早於國家記憶研究院，在 1982 年就成立了，一直都在推動社會工作，而國家記憶研究院是 2000 年才成立的，KARTA 的共同創辦人之一 Zbigniew Gluza 甚至被邀請去國會協助制定《國家記憶研究院法》。但是國家記憶研究院成立後，KARTA 對研究院的態度轉為批判，因為認為研究院沒有聆聽他們的意見。

⁹ 訪團於捷克布拉格參訪時曾在路上巧遇紀念 Jan Palach 的兩個雕像，名稱叫「自殺者之屋和自殺者的母親之屋」（Jan Palach Memorial - The House of Suicide and the House of the Mother of Suicide）。

¹⁰ 2017 年 10 月 19 日，波蘭人 Piotr Szczyński 為了抗議法律及正義黨執政後，對波蘭民主法治以及社會造成的損害，在華沙市中心自焚。

KARTA 認為應透過公開資料讓民間研究者進行研究，認為官方的報告通常都會為政府宣傳、服務。KARTA 以波蘭 2010 年斯摩棱斯克空難的悲劇為例，原先執政的公民綱領黨政府撰寫了一份官方報告，當時的報告表示這是一場空難意外（因為天候不佳，以及不應該在這樣的天候下降落，俄國塔臺也給了不正確的指示），但之後上臺的法律及正義黨政府否定了這份報告，認為這是普丁和波蘭總理圖斯克（Donald Tusk）聯手進行的陰謀。因為如此，波蘭社會劇烈地分裂成兩派，人們把這場空難當成意外還是政變¹¹，取決於人們的政治立場。因此 KARTA 認為無法把官方報告當成最終的歷史真相，畢竟有可能會被下一個政府否定。

有關公部門與民間團體的合作情形，KARTA 表示雖然政府有時候會找他們諮詢，但都比較表面，對政府的決策沒有影響。例如他們曾為政府撰寫如何面對政治歷史的專業意見報告，政府認為報告寫得很好，但並沒有照他們的建議去做。波蘭之前執政的法律及正義黨政府對歷史的態度是民族主義傾向的，對鄰國較有敵意，因此 KARTA 盼對現在的政府提出建言¹²，建議政府如何用新方式面對和鄰國的政治歷史，以改善和德國、烏克蘭等鄰國的關係，然而建議未被新政府採納。另外，KARTA 現在因為財務困難面臨存續的危機，雖然有來自社會的幫助，但 KARTA 找不到可以從官方獲得協助的方法，原因是波蘭補助非政府組織的相關法規不夠完備，非政府組織難以從政府獲得資源。

另外 KARTA 表示，儘管國家記憶研究院有很強的檢察起訴部門，可起訴關於納粹、共產、烏克蘭犯行，但是國家記憶研究院查到了證據也不能懲罰任何人，因為犯罪的人很多都已經過世了。

四、所藏文件史料公開程度尊重捐贈者意願，並進行出版等教育推廣活動

KARTA 表示他們擁有許多國家沒有收藏的文件，並與訪團分享一件往事：國家記憶研究院曾經派檢察官至 KARTA，因為研究院覺得有些文件應該保存於政府。起因是有一位研究者在過世後將其所收藏和軍事、法庭有關的文件捐贈予 KARTA，這位研究者被懷疑在做研究的時候，把文件從國家記憶研究院或其他國

¹¹ 當時波蘭總統卡辛斯基（Lech Aleksander Kaczyński）亦在這場意外中喪生。

¹² 2023 年 10 月選舉後，波蘭政黨輪替，法律及正義黨下野，民主聯盟上臺（民主聯盟以中間偏右的公民綱領，以及一些其他中間派和左派政黨組成），不過總統仍是法律及正義黨。

家檔案機構攜出。因此國家記憶研究院派了幾個檢察官來，要他們將文件交出，但檢察官並未找到那些文件。

至於所收藏文件的公開程度，KARTA 表示因有很多文件是私人捐贈的，他們會和這些文件的捐贈者簽約，註明文件的公開程度，包含是否可以數位化、是否可讓人閱覽。也有一些文件，是捐贈者說要等死後 50 年才能公開（比如亞采克·庫倫的獄中日記），這時就會尊重捐贈者的意願，不在任何地方公開。人們可以到 KARTA 的閱覽室閱讀館藏文件，但不能攜出，拍照複製也不能超過 10%。

KARTA 曾發生兩次文件被偷的事件，第一次被偷的文件是雅魯澤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親自給 KARTA 的信¹³，信中訴說從他的觀點怎麼看待戒嚴。第二次被偷的文件是和維斯瓦河行動以及沃里尼亞與東加利西亞地區的種族屠殺事件有關¹⁴。後來當這件事被波蘭民族主義者知道，甚至在報紙上控訴 KARTA 讓烏克蘭人進來把文件偷走。不過 KARTA 自嘲他們常常被人控訴，有時候人們看了他們寫的東西，會說 KARTA 親烏克蘭，有時候人們又會說 KARTA 親波蘭。

除了史料的徵集和保存，KARTA 也做很多口述歷史訪談，例如針對被送到蘇聯勞改營的生還者、華沙起義、戒嚴時期的相關口述歷史訪談；也會利用所藏的文件做教育推廣的活動，並出版許多刊物書籍。

● 拜會小結

KARTA 基金會已成立運作超過 40 年，在波蘭民主化之前就在地下進行反抗運動工作，歷史相當悠久，在波蘭有相當的知名度。他們收藏各類豐富的史料，除了 KARTA 以前發行的地下刊物，也有許多私人捐贈的文物，諸如信件、郵票、打字機等，見證波蘭爭取民主的地下運動歷史。

拜會 KARTA 基金會使訪團得以聆聽不同於波蘭官方的聲音，瞭解民間組織對波蘭政府（以國家記憶研究院為主）的批判與建言，在看待波蘭的轉型正義時，

¹³ 雅魯澤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在 1981 年宣布波蘭戒嚴。

¹⁴ 二戰期間，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為了爭取烏克蘭獨立，在納粹佔領下的沃里尼亞與東加利西亞地區發起對當地波蘭平民的屠殺；雖然命令是殺害青壯年男子，但很多婦女和小孩遇害，死亡人數在 6 萬到 12 萬人之間。

可以有比較全面的觀點。雖然國家記憶研究院的工作範圍廣泛，包含許多轉型正義面向，然而 KARTA 批判國家記憶研究院的工作推動受政治力影響較深，對研究院提出的歷史研究報告多有質疑，也批評追訴加害者的成效有限。KARTA 亦希望政府除了偶爾向他們諮詢意見外，可以真正採納民間的建議。

不過，比起經費充足、運作穩固的國家機關，KARTA 基金會的經費來源比較不穩定，這也連帶影響基金會的運作，並表示在波蘭民間組織難以從政府方面獲得資源或財源，盼政府能夠修法或有其他機制支持民間組織的運作。



2024.09.03 訪團拜會 KARTA 基金會



2024.09.03 KARTA 基金會共同創辦人 Alicja Wancerz-Gluza 導覽檔案庫房

第四節 拜會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

- 拜會時間：113 年 9 月 3 日 星期二 下午 1:00
- 接待人：董事會主席 Maciej Nowicki、董事會秘書 Mafgorzata Szuleka、顧問 Marcin Wolny
- 機構簡介

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的前身是於 1982 年戒嚴期間成立的赫爾辛基委員會，起初是一個建立波蘭與外界網絡連結的地下組織。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於 1990 年正式成立，是波蘭歷史最悠久的非政府人權組織。該會致力進行人權倡議，對立法草案提出意見，並對已經生效的立法提出修改建議，使其充分考慮人權。

- 拜會紀要

一、政府會諮詢民間團體，但實際影響有限，期盼政府更重視法治及人權

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表示，在不同的時期，波蘭政府和民間的關係都不同。過去八年，法律及正義黨執政時，少與民間團體有合作；只有在一些外交的部分有合作，其餘的合作就只流於形式，民間的聲音對政府沒有任何意義。現在新政府執政後，情況改變了，民間團體在行政、立法方面與政府有比較多合作，但這也不代表民間團體就對政府的施政很有影響力。波蘭處在一個重建民主的階段，如果公民意見諮詢不再只是做做樣子，而是會真的被政府聆聽，那民間團體和政府的合作就會變得比較好。基金會進一步補充，波蘭的公民社會很蓬勃，有登記的民間團體就有 15 萬個；但是政府聽不聽公民的聲音又是另一回事。而在這些民間團體當中，處理人權議題的只佔 2%，大部分民間團體處理的是社會公益、運動、教育、在地的議題。

訪團提及，本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有民間委員參與，亦經常諮詢民間團體意見；對此，基金會認為，波蘭還沒有走到這種程度，雖然法律有規定政府在施政時要諮詢公民的意見，民間團體可以在各個階段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是不一定會對政府的決策有實質的影響。基金會偶爾有機會受邀去眾議院提供意見，但是這類意見諮詢並非法律明定的機制，而是要看負責的政治人物願不願意。基金會會

將一些有爭議性的案子交給法庭審理，當獲得了對人權來說正面的判決，就有機會影響政治人物，讓他們做出改變。

基金會對新政府的期待包含基本人權還有法治運作。過去八年最大的問題是政府欠缺法治運作，因為行政機構和立法機構試圖破壞司法體系的獨立性，將其納為己用，所以重建司法的獨立性相當重要，是很困難的過程。基金會也希望政府聆聽歐洲機構（如歐盟）的聲音，也希望政府注意到移民的權益，因波蘭和白羅斯的邊境有很多移民問題。此外還有女性的權益、合法墮胎的權益、同性伴侶的權益、平權的權益、性平教育、性健康的權益、以及不要迫害那些爭取平權的運動者。這些期待，也是本次選舉民主聯盟提出的承諾，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會贏得該次的國會選舉。許多去投票的人是女性，因為她們希望自己的權益可以受到保障。基金會也坦言，政治人物也時常會以公眾壓力為由，拒絕做出改變；以同志伴侶法為例，民眾的支持率超過六成，歐洲人權法院也要求波蘭要立法保障同志伴侶的權益，但波蘭政府至今沒有立法。

二、波蘭人事除垢過程有侵犯人權之虞，被指控者缺乏為自己辯護的機會，被稱為「野蠻除垢」

基金會主張，波蘭的轉型正義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轉型正義階段是針對共產時代，而那個時代的轉型正義到今天都還沒有結束；第二個轉型正義階段則是現在，要面對過去在法律及正義黨執政下，民主崩壞的八年。基金會稱，有些歐洲的研究者，也說現在波蘭面對的是「轉型正義 2.0」；基金會很努力在處理第二階段轉型正義的工作，尤其是關於司法的部分。

針對共產時代的轉型正義，波蘭用了幾個方式去處理共產時代留下的問題。首先，共產主義的犯行，是交由司法體系來解決；波蘭會去辨識受害者、尋找加害者，這項工作由國家記憶研究院持續進行。另一個方式是人事除垢；想要擔任公職的人（政治人物、法官、檢察官等）必須作出聲明，表明自己有沒有在共產時代和秘密警察合作。這些案件直到今天都在審理，最好的例子就是前總統華勒沙。除垢法庭判定，華勒沙沒有做出不實的陳述，沒有和秘密警察合作，但是多年後出現一份文件，指說華勒沙在 1970 年代有和國安單位合作，法庭並據此判定華勒沙是秘密警察的協力者。這件事被稱為「野蠻除垢」（dzika lustracja），過

程中，法庭不讓華勒沙有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只憑文件，就說他是協力者；而這個針對華勒沙的判決是發生在 2022 年的事。

基金會說明，這些軍、警、情治單位的文件已經三十年了，由於文件有條件地開放，記者、研究者可以去閱覽，他們會摘出一些特定的段落，把這些段落公開給社會，指控某人（不只是擔任公職的人，也包括演員、導演等公眾人物）曾和秘密警察合作，但是被指控的人無法提出完整的背景，無法上除垢法庭為自己辯護，只能在一般法庭控告指控他們的人。而且，那些檔案也常常缺東缺西，它們不是完整的文件，很多被毀壞，裡面也有為了對付團結工聯的運動者而偽造出來的文件，因此很大程度侵害了那些被指控者的人權。

三、儘管共產主義已遠去，仍持續影響波蘭社會

基金會表示，共產主義已經過去快四十年，它帶來的影響和創傷已經開始從波蘭社會中消失；但另一方面，各界對除垢的做法還是有很多不同意見，當這些事情在公眾空間中被討論，還是會激起一些活過共產時代的民眾的情緒，但畢竟已過了兩代，影響力已有減退的趨勢。不過，由於年輕人對那段共產歷史並不是那麼了解，因此對於除垢的議題就比較無法深刻感受；關於除垢的做法，仍應有公平、公正的法制機制來推動。

另外，在政治實務上，有些學者則認為法律及正義黨讓共產主義復興。雖然該黨表面上反共，但所做的事和共產黨是類似的，也是反民主的，只是打著不同的旗幟；因為他們認為只有自己的黨能帶領人民，因此很中央集權，並且反對權力分散。由此可見，強化對歷史記憶及極權主義的認識，才能避免極權再度發生。

四、除追究加害者，紀念、賠償、研究、教育工作也同等重要；創傷療癒工作相對缺乏

轉型正義的方式有很多種，有追求真相及和解的模式，也有追究加害者責任的模式。基金會認為很關鍵的因素是：那些之前在共產體制或威權體制當中的人，現在是不是還在政壇上活躍？如果是的話，那轉型正義的工作就會很不容易推動；如果不是，如果大家都覺得共產時代已經過去，而大家都有共識，最重要的是打造民主、紀念／賠償受難者、讓研究者做獨立研究、公開檔案，並且推動給年輕

人的教育，那轉型正義的工作就會比較順利。除了追究加害者的責任，這些其他工作也是同等重要的。

至於政治受難者創傷療癒的問題，基金會表示，在波蘭對此沒有大規模的討論，只有在心理學界或是文學作品中，才有少數討論。這可能也和共產主義崩解後，社會很快又進入另一個階段的動盪有關，大家沒時間好好坐下來思考自己之前經歷了什麼。在共產主義之前，還有二戰時期，這些歷史都有留下創傷，不管是抗爭者的創傷，還是平民的創傷，都沒有被好好地消化、正視。而這對人們如何思考、如何下決策，有很深的影響。但是，在政治方面，人們沒有去反思這件事，只常常說，等那些「老蘇聯人」、「老共產主義者」離世，這一切就會結束了；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些創傷會一代傳一代。

五、關注臺灣司法體系改革經驗，期盼後續交流

基金會詢問，當臺灣從威權統治時期走向民主時代，如何改革司法體系？訪團解釋，在威權統治時代，即使是平民也會被以軍法審判；審判的法官也不是一般的法官，而是軍法官。在民主化後，就不再用軍法及軍法官來審判平民。不過，法官確實還沒有完全去除威權時代的思維，因為過去訓練法官的機構，就是一個很黨化的機構。當然，民主化會慢慢改變，但不是一次性的改變。

另外，由於基金會每年都會舉辦人權影展¹⁵，因此也期盼後續可以與臺灣針對威權統治相關的影音紀錄進行交流，透過人權教育議題深化雙邊關係。

● 拜會小結

與 KARTA 基金會相似，作為民間團體，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同樣對波蘭官方的轉型正義作法有所批判，特別是針對人事除垢的過程。基金會認為波蘭除垢做法的公平、公正性尚值審酌，並舉華勒沙被指控是秘密警察協力者一案為例，批評政府沒有給被指控者足夠的機會為自己辯護，僅憑一紙文件就武斷地下定論，使被指控者蒙受汙名，這是一種「野蠻除垢」。

¹⁵ 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所舉辦的人權影展名為 Watch Docs，從 2001 年舉辦至今，根據網站介紹，每年會播放約 50 部來自世界各地的紀錄片，除了在華沙放映，還會到全國 30 個城市巡迴，每年觀眾約有 10 萬人。網址：<https://watchdocs.pl/en>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基金會指出，有些人認為波蘭除了處理共產時代遺留的問題外，現在也要修復近年政府對波蘭民主及人權造成的傷害。也因此，基金會對重建波蘭民主與人權有很強烈的使命感，期盼整頓法治，並建立開放多元的公民社會。

從波蘭的案例也可反思，雖然表面上威權統治看似遠去，但隨時都有復辟的可能，如何保衛得來不易、但有可能會因政黨輪替失去的民主與人權，以及厚植可與威權主義抗衡的公民社會，不再重蹈覆轍，亦是轉型正義的重要目標。



2024.09.03 訪團拜會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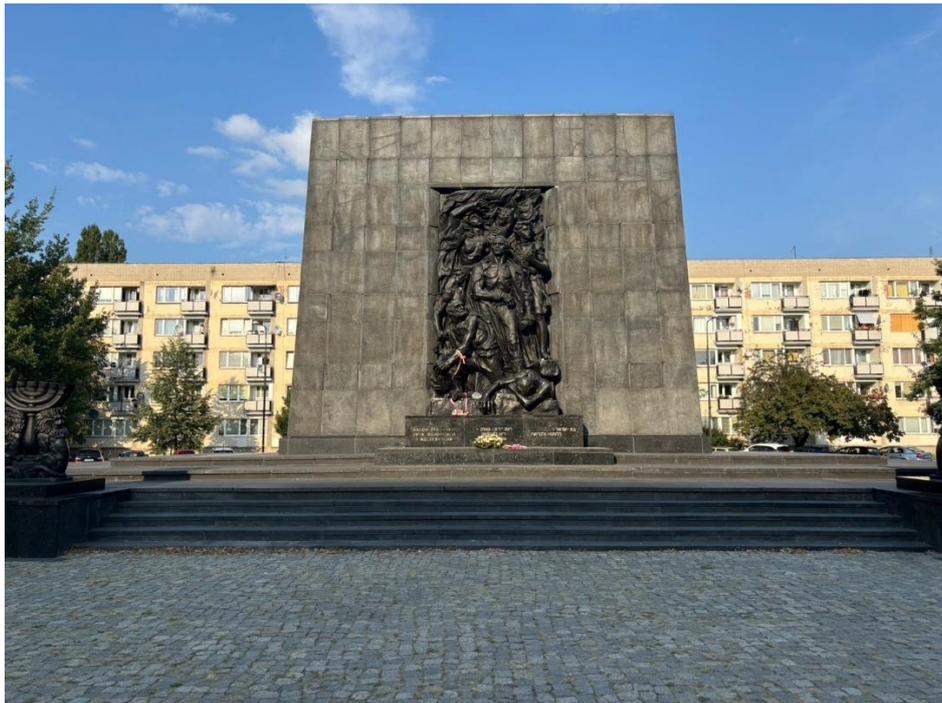
2024.09.03 訪團拜會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

第五節 參訪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

- 參訪時間：113 年 9 月 2 日 星期一 下午 5:00

這個 1948 年建立的紀念碑旨在紀念 194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於華沙猶太人隔離區的起義行動。這場行動是二戰期間猶太人最大規模的起義，最終以失敗告終，共有約 13,000 名猶太人遭到殺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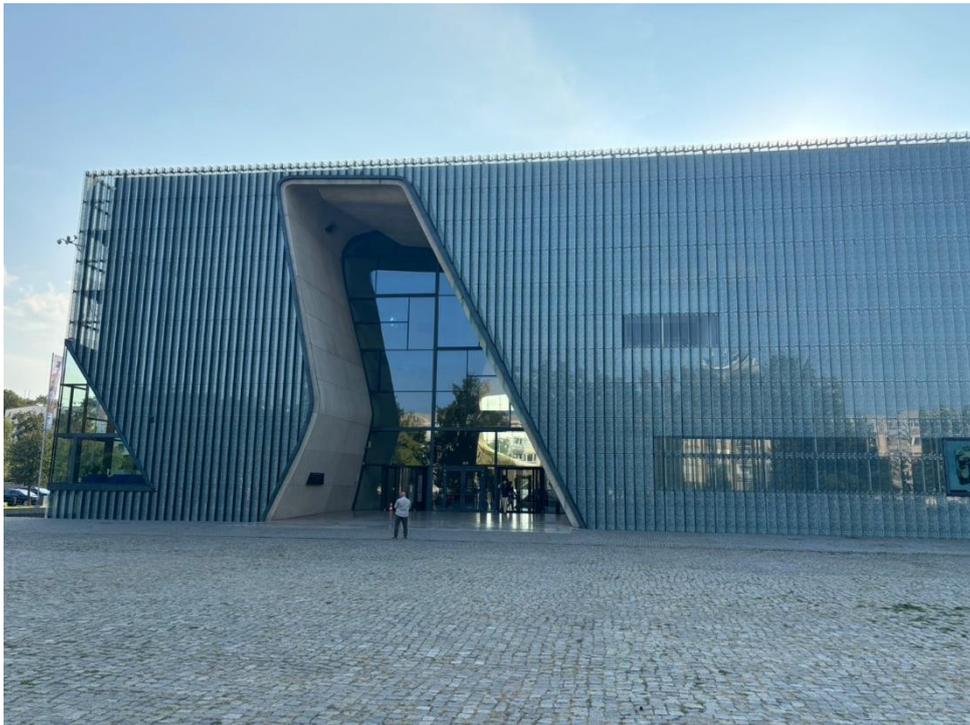
1970 年 12 月 7 日，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在紀念碑前敬獻花圈後，突然自發下跪，為納粹德國的侵略及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此一舉動震驚世界，被稱為「華沙之跪」。在紀念碑周邊也因而設置了重現「華沙之跪」畫面的紀念浮雕。



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



紀念碑周邊的「華沙之跪」紀念浮雕



紀念碑對面的波蘭猶太人歷史博物館

第六節 參訪華沙起義博物館

- 參訪時間：113 年 9 月 4 日 星期三 上午 10:20

華沙起義博物館設立於 2004 年，以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支持及參與華沙起義對抗納粹的國內外義士。華沙起義是波蘭最悲壯的歷史之一，自 1944 年 8 月 1 日起持續了 63 日，直到 1944 年 10 月 2 日波蘭反抗軍向德軍投降。二戰末期，華沙的地下反抗軍隊波蘭家鄉軍（Armia krajowa/Home Army）想要在紅軍來之前自行解放華沙，因此發起了起義行動。在缺乏外援（雖然盟軍有空投一些物資和武器，但還是不足）、指揮混亂的情況下，起義以失敗告終。波蘭反抗軍投降後，德軍摧毀華沙全城 85% 的建物，最終造成近 20 萬華沙人喪命，另外 50 萬名倖存者則遭納粹驅逐家園，其中許多人被送往集中營。



華沙起義博物館入口處標語：We wanted to be free and owe this freedom to nobody.



博物館重現了華沙起義時反抗軍藏身的狹窄下水道，並讓參觀者鑽進去體驗置身其中的壓迫感



盟軍的空投地圖與空投的物資，包含武器、藥品與乾糧



當時使用的槍枝



當時軍人和護士的衣物



地下傳單複製品與印刷傳單的機器



防空洞複製品



碎布製成的波蘭國旗與波蘭反抗軍的標誌

華沙起義博物館的展覽的動線規劃，可以讓人循序漸進地走入那段歷史，彷彿走入當時的時空。館藏十分豐富，館內有大量照片，還有許多文件原件或複製品，如當時軍人和護士的臂章和衣物、飛機、空投物資、地下傳單等。而展覽呈現方式也很多元，除了一般的展示外，也重建下水道及防空洞讓人可以實際體驗置身其中的空間感，也有多媒體影像，其中在一個放映廳可以戴上眼鏡看 3D 影像，而在另一個地方，則是有猶太隔離區的歷史紀錄影像嵌在牆上。走在館內也不時會聽到隆隆炮聲，牆上還有可讓人帶走的小張日曆，讓參觀者看到某一天發生了什麼事；有地圖讓人對當時的戰況一目瞭然；解說牌也有波蘭文和英文雙語。臺灣的博物館或展覽，可以學習華沙起義博物館的策展方式，讓展覽形式更多元，並提升互動性，更有助於讓參觀者理解嚴肅的歷史敘事。

第三章 拜會捷克人權及轉型正義相關機關（構）

第一節 拜會共產黨罪行調查警務局

- 拜會時間：113 年 9 月 5 日 星期四 上午 10:00
- 接待人：局長 Dalimil Sypták、副局長 Eva Michálková、內政部警政署官員
- 機構簡介

共產黨罪行調查警務局（以下簡稱警務局）成立於 1995 年，職責主要為調查 1948 年至 1989 年共產黨政府安全部門的犯罪行為，特別是秘密警察、警察與其他機關人員之犯行，如刑求、非人道處置等。該局是歐洲後共產國家中，唯一針對轉型正義工作成立之警務單位。調查過程中，警務局與相關機關有密切合作關係，並會將調查研究成果轉化為公共記憶與教育的素材。

- 拜會紀要

一、公職人員濫權所犯重罪，無追訴時效問題

座談開始前，警務局播放關於該局的介紹影片，片長約 15 分鐘，內容除了介紹該局業務事項，也將鏡頭帶到納粹與共產黨時期的強迫勞動營和關押政治犯的監獄，其中一些監禁空間如今已轉變為博物館，作為人權教育場域。

警務局是全歐洲處理轉型正義工作唯一有調查權的警務單位，專門偵查 1948 年 2 月 25 日到 1989 年 12 月 29 日期間公職人員濫用職權所做出的「非法行為」，這些「非法行為」在當時的法律即屬非法，包括違反當時的法律或國際公約規定事項；或在此期間犯下因政治、種族或宗教原因迫害個人或群體之罪行，且為至少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者。訪團提及，在臺灣，起訴威權時期犯行者是否違反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是一長期爭論的法理課題，警務局則表示在捷克這不是需要克服的限制，捷克共產黨時期公職人員濫用職權所犯下的重罪，皆可追訴。

警務局進一步說明，調查主要是針對前國家安全人員的行動。當時國家安全人員的主要任務是鎮壓任何反對共產政權的行為，直到 1989 年秋天共產政權倒臺前，異議份子以各種不同形式表達反共立場，包括透過地下出版品、藝術作品、

演講、參與未經授權的示威等；在這些公民的聽證會上，前國家安全部門透過清理、報復、毆打、開除、霸凌、取消社會福利等手段，意圖讓人們的生活跌入谷底。另一個調查面向是調查邊境人員向逃往民主國家（奧地利或德國）的公民開槍的行為。

警務局也舉例，某些當時的法令與憲法或國際公約是有差異的，例如在國家邊境開槍的問題，根據當時國家安全部長的法令和內政部長的命令，邊境警衛有權對手無寸鐵穿越邊境的人開槍，但這違反了憲法（生命權）和公約（離開自己國家的權利）；以法律位階來說，憲法和國際公約高於部長命令。

二、目前仍有上百件調查中案件，調查過程與其他機關合作緊密

調查的案件來源以警務局主動調查最多，其次為法人或機構提起的申請，再次則為個人所提出的申請。個人所提申請數量最少的原因，可能因為大多數人不知何為「罪行」，亦不知該等「罪行」並無追訴時限所致。

在調查案件時，法律賦予警務局向機構、法人實體和自然人索取資訊的權利，警務局非常依賴書面證據，因為僅憑藉受害者本身的證詞是不夠的，因此，他們與其他機關，例如極權政權研究中心、安全部門檔案局、其他檔案館或大學檔案館有著緊密的合作，請其他機關提供調查或起訴所需的資料，並且會請極權政權研究中心提供歷史觀點的專業意見，提供作為起訴加害人的評估資訊。例如，對於共產黨執政時期中央委員會實際的工作內容及範圍。

警務局表示，目前大約還有 150 個案件在調查中，通常每年可以起訴十幾人。警務局有大約 13、14 名獨立調查員，彼此也會互相幫忙；在複雜的案件中，則會成立調查小組。調查的時間長度取決於案件的性質，簡單的案件可以在 3 個月內完成，有些情況可能需要 1 至 2 年的時間，更複雜的案件需要更長的時間。除了分析安全部門檔案局檔案中的歷史資料、並製作副本，也需要若干人來作證；如果是武裝部隊成員，則必須獲得捷克內政部長簽署的保密棄權書。有些被起訴人年事已高，也需要一些時間進行可能的審查，例如被起訴人是否能夠理解其行為的意義和目的；從而得出結論。

警務局稱，成立以來所起訴的案件 100%為法庭接受，惟有部分被起訴人於審判過程中死亡、或是因年紀過大無法自我辯護而停止審判，其餘案件的定罪率為 100%，共有約 250 人被定罪。警務局認為，以事件發生年代如此久遠來說，這樣的定罪數並不低。

三、發展認罪協商機制，透過基金賠償受害者、補助推動「記憶」的機關與民間機構

共產黨罪行調查警務局目前正在發展「認罪協商機制」，讓被起訴人承認罪行，經法庭批准後，沒收其不法所得(金額由法庭評估被起訴人之財產狀況決定)。所沒收的金錢有以下兩種用途：第一種是進入國家帳戶，捷克現正規劃成立「基金會」，用以賠償 1970 至 80 年代被強迫驅逐出境的人、或是支應當時被強迫離職人員的退休金、或是用以資助推動「記憶」的機關與民間機構，例如極權政權研究中心、戰後；第二種則是直接轉入受害人帳戶。

訪團問及捷克民眾整體如何評價起訴加害者的政策方向？如何處理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壓力和意見？警務局表示，大部分的公眾及共產政權下的受害者非常支持該局的業務，因為過去極權主義統治的時間很長、影響深遠。警務局稱，成立近 30 年以來，他們以公正性建立了穩固的地位，並且依法行政，並不會因不同執政黨上臺而影響其工作。畢竟，該局無疑是屬於記憶機構之一，因而能夠受到支持。

四、從調查起訴到公眾教育的推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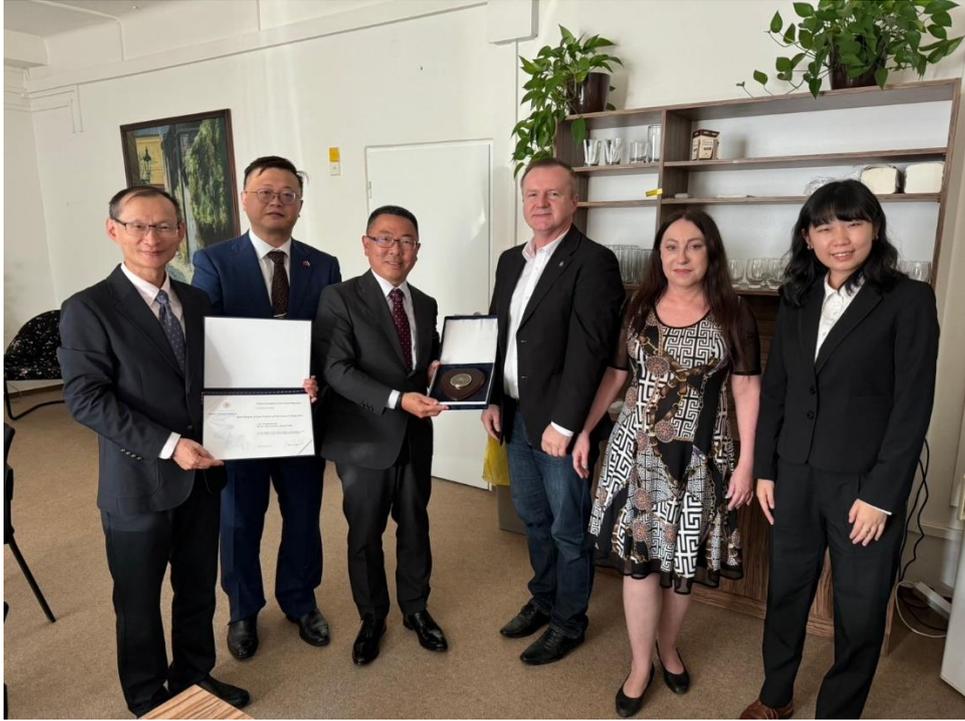
警務局送到法庭審理的案件均會在媒體上發布，一般民眾可以看到法庭的定罪情形，或是被起訴人是否認罪。警務局除了進行調查與起訴之外，也有研究團隊進行研究，同時，他們支持調查部門將資金用在檔案的搜尋與分析上，尤其是搜尋國家安全部門在壓迫時期可能實施的犯罪活動證據。研究結果可用於支持偵查與起訴，並且會向大眾公開研究成果，包括以出版論文、撰寫專欄短文、電視廣播媒體的訪談、或是到高中、大學進行演講講座等方式進行教育推廣。過去，他們也舉辦了許多展覽，記錄了該部門所從事的特色主題，包括 1950 年代監獄中的不人道條件等。

警務局認為，捷克的年輕人對於共產黨時期的歷史所知有限，但這段歷史對於受害者和其家庭具有深刻意義，不應該忘記；捷克有句諺語：「若不記得自己的歷史，歷史將會再來。」因此，對於「記憶」的工作必須持續。近年隨著俄烏戰爭爆發，年輕人也比較開始注重共產黨統治時期歷史記憶的重要性。

- 拜會小結

警務局的存在相當特別，是歐洲後共產國家中唯一專門處理轉型正義的警務機構，具有調查權，可調查 1948 至 1989 年間共產黨政權的濫權罪行，調查過程仰賴與極權政權研究中心、安全部門檔案局等機關的密切合作。透過法庭起訴與認罪協商機制，警務局確保加害者承擔責任，並將沒收之金錢用於賠償受害者或支持相關記憶機構的發展。此外，該局會向公眾公開案件審理進展，並以出版、媒體訪談及學術講座等方式推廣教育，促使社會重視極權歷史記憶。

即使距離共產政權垮臺已超過三十年，警務局至今仍在進行加害者的調查與起訴工作，不過，真正被定罪的僅有 250 人左右，這項工作仍要持續進行。而訪團接下來拜會的極權政權研究中心及安全部門檔案局，也坦言捷克對加害者定罪的工作有其困難，實際被定罪的人數仍為有限。



2024.09.05 訪團拜會共產黨罪行調查警務局



2024.09.05 訪團拜會共產黨罪行調查警務局

第二節 拜會安全部門檔案局、極權政權研究中心、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

- 拜會時間：113 年 9 月 6 日 星期五 上午 9:30

- 接待人：

安全部門檔案局：局長 Miroslav Urbánek、服務辦公室主任 Lubomír Augustín、檔案數位化及保護處處長 Juraj Kalina

極權政權研究中心：主任 Ladislav Kudrna（線上）、第一副主任 Kamil Nedvědický

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執行董事 Peter Rendek

- 機構簡介

極權政權研究中心由捷克政府於 2007 年成立，其目的是收集管理、分析和提供納粹（1939-1945）和共產主義（1948-1989）極權主義政權的檔案，亦致力於學術研究與教育推廣工作。

捷克政治檔案之開放最初並非完全對外公開，而是採取逐步進行之做法，透過法律漸次擴充其適用範圍，自 1989 年起直到 2008 年才真正公開。安全部門檔案局為捷克極權政權研究中心的夥伴機構，運作經費來自政府預算。該局保管共產黨統治時期各安全部門的檔案，並依捷克法律對公眾開放。

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是基於歐盟的教育性計畫，於 2011 年由捷克倡議成立，匯集了來自 23 國家的公共機構及社會組織，積極從事關於極權主義政權罪行的研究、記錄、提高認識及教育工作，並設辦事處於捷克布拉格。

- 拜會紀要

安全部門檔案局、極權政權研究中心、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 3 個機關（構）共同於安全部門檔案局場地與訪團進行座談。為避免混淆，以下分列 3 個單位的座談紀要。

【安全部門檔案局】

一、典藏檔案數量龐大，持續進行檔案數位化工作

在座談開始前，安全部門檔案局先帶訪團實際參觀檔案數位化工作進行方式及紙質修護方式，並參觀檔案庫房。檔案局主要的工作是整理檔案（所藏的大部分檔案是紙質文件或照片，亦有微卷檔案），進行數位化後提供外界應用；每年約提供 5,000 人次的應用申請。檔案局員工約 150 人，其中 80 人負責檔案保存工作，另 70 人則辦理數位化及修復等工作。

在檔案數位化工作的部分，安全部門檔案局共有 3 個檔案數位化辦公室。檔案局表示，檔案數位化工作除了讓脆弱的紙質資料能夠用另外的方式被保存，同時也讓研究者方便進行研究。目前檔案局典藏的檔案數量約有 3,700 至 3,800 萬，已超過 20 公里，年代涵蓋 1939 年至 1990 年。目前檔案局每年大約可以掃描 70 萬至 80 萬頁的檔案，但已完成數位化的檔案約只占總數的 10%，至少還會需要幾十年才能完成全部數位化工作。掃描完成的數位檔案，則由安全部門檔案局及極權政權研究中心共同擁有。

二、介紹文件保護及修復工作，採可逆修復方式

安全部門檔案局也帶訪團實際參觀文件修復工作。在檔案數位化工作之前，檔案局會先進行檔案的預防保護與修復等工作，如透過「水洗」、「冷凍」、「去酸」、「中和化」等不同方式延長物件的壽命；用「日本紙」作為修復文件的材料，將日本紙染色成接近原本檔案紙張的顏色（但不能完全一樣，要看得出與原件的差異，以辨別哪些部份是後來修復的），透過特殊的纖維製成的膠黏補至破損缺漏處。所有的修復過程都是可逆的，這樣如果未來有更進步的修復方法時，可以重新利用更新的技術來修復。訪團問及檔案局是否如同德國經驗，有還原碎紙的工作？檔案局表示未收到過這類經碎紙機處理過的檔案；但有些手撕的較大塊的碎紙，是可以還原的。

三、檔案採最大程度開放，資料運用由使用者自行負責

檔案局的庫房所收錄的安全部門檔案，主要係按主題分類。檔案局讓訪團翻閱部分檔案，有線民的資料、國外城市的地圖、情報活動的照片、錄音帶、手繪

海報等。在 2007 年以前，檔案分散於各不同機關，檔案開放應用做法不一；2007 年極權政權研究中心及安全部門檔案局成立後，則將安全部門檔案集中由檔案局保管。極權政權研究中心是安全部門檔案局的上級機關，也是最密切的合作夥伴，此二機關均依 2007 年所定的組織法成立（181/2007 Sb.）；該法生效後曾有段插曲，有幾名共產黨背景國會議員在憲法法院上訴，質疑極權政權研究中心及安全部門檔案局的合法性，但並沒有成功。

捷克安全部門檔案採最大程度開放方式對外提供應用，其所藏檔案幾乎全數開放，且對個人隱私不加遮掩；申請者應簽定切結書，依捷克法律規定，個人資料保護屬於使用者之責任；申請者也可翻拍檔案，但後續對外發布或運用要自行負責。訪團詢問捷克徵集檔案的過程中，是否曾面臨機關抗拒提供檔案的情況，檔案局則稱僅在該局剛成立時有遇過，主因是機關主事者仍是共產時代握有權力的人，後來則沒有什麼徵集不順利的情況，因為人事除垢將共產黨員從原本的位置撤換了。

【極權政權研究中心】

一、透過檔案研究極權政權，提供專業意見予調查或司法機關參考，並避免重蹈覆轍

極權政權研究中心以安全部門檔案局所藏檔案為基礎，研究曾統治過捷克的納粹與共產黨兩個極權政權，並負責教育推廣任務。教育推廣的方式包括：舉辦國內外會議、展覽或是出版。另一個重要任務是國際合作，由於共產黨政權曾統治許多歐洲國家，因此，極權政權研究中心也會公布研究成果進行跨國經驗的比較，目的在於避免極權歷史再度發生。極權政權研究中心主任會負責訂定研究規劃，在整體規劃下，每位研究專家都有自己的計畫與定期目標。此外，極權政權研究中心並無調查權或司法權，僅會描述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提供專業意見予調查或司法機關參考。雖然許多的加害者未被定罪，但是通過對於歷史事件的描述、記錄，可以讓各界了解過往極權壓制人權狀況，避免歷史重演。

二、員工入職須提交安全檢查證明，自證並非前共產黨員；加害者定罪人數有限

為避免過去極權政權的參與者或協力者進入極權政權研究中心或檔案局工

作，他們規定，曾為共產黨員者，不得於這兩個機構服務。據研究中心說明，雖然沒有專責辨識共產黨員身分的機關，但員工需提供安全檢查證明(類似良民證)，來證明自己並非共產黨員。過去曾發生三位員工被發現未提交安全檢查證明，因而無法在此工作。儘管如此，研究中心及檔案局也坦言捷克很難完全撤換所有曾與共產黨有過合作的人，因為數量實在太多了，甚至有些人對國家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力及權力，如富有的企業家。對加害者定罪的工作也有其困難，主要原因是因為需要依據過往的法律規定來定罪，而過往共產黨具有修法的權力，會將法律修正為符合自身的利益，因此實際被定罪的人數仍有限。

【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

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於 2011 年由歐盟成立，積極從事關於極權主義政權罪行的研究、記錄及教育工作。每年會出版年度報告，說明資金運用與業務推動狀況。資金的來源包括國家資助、會費收入、其他國家的資助等。平臺如今已有超過 70 個夥伴成員，包括不同國家機關、民間組織、博物館、檔案館或是流亡政府等。平臺也與極權政權研究中心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透過平臺合作，辦理跨國會議、製作教育遊戲、展覽等，可以讓許多轉型正義工作推展更有效，也有助於讓人們意識到現在進行式的極權主義威脅，如俄羅斯對歐洲民主及人權帶來的威脅，或近年斯洛伐克或匈牙利等國民主倒退的情況。他們也幫助戰爭中的烏克蘭將受到威脅的文物進行數位化。在國際合作的部分，過往比較沒有與亞洲國家合作的經驗（曾和韓國一個非政府組織有過合作），但很期待接下來可以與亞洲有更多交流，研究議題也並不一定以「歐洲」為限。

● 拜會小結

安全部門檔案局、極權政權研究中心、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 3 個機關（構）有緊密的合作關係—安全部門檔案局負責檔案的保存、修復與數位化工作；極權政權研究中心透過檔案進行研究，並提供專業意見予調查或司法機關；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則致力於進行跨國合作串聯與教育推廣工作。安全部門檔案局所藏的檔案數量相當龐大，與其他國家很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捷克的檔案採最大程度開放方式對外提供應用，且對檔案中所載個人隱私完全不加遮掩，由檔案使用者自行為檔案的運用方式負責；與臺灣政治檔案條例中對涉及個人隱私部分有所保護

的情況不太相同。

從捷克檔案徵集的過程，也可以看出人事除垢作為轉型正義的作法之一，對公共事務的運作具有一定成效。起初，有些握有安全部門檔案的機關因為內部人員仍是過去共產時代掌權者，原本相當抗拒將檔案移轉給安全部門檔案局，但後來因為人事除垢的推動，這些人遭到撤換，檔案徵集的阻力也隨之消失了。臺灣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也時常面臨類似的情形，由於威權統治時期於機關中掌握權力的人，在民主時代仍持續掌有一定的地位，使轉型正義相關政策的推動窒礙難行；如何在不侵害人權的前提下，借鏡歐洲民主國家經驗，讓臺灣公部門轉型正義的推動更加順利，是需要持續思考的課題。



2024.09.06 安全部門檔案局帶訪團參觀檔案數位化工作



2024.09.06 安全部門檔案局帶訪團參觀檔案修復工作



2024.09.06 安全部門檔案局帶訪團參觀檔案庫房

[Archiv bezpečnostních složek](#) > [News](#) > Visit of a delegation from Taiwan

VISIT OF A DELEGATION FROM TAIWAN

On September 6, 2024, the Minist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Mr. Ming-Hsin Lin, visited the Security Services Archive with a delegation from the Human Right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Departm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The main goal of the visit was the exchange and sharing of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archives, legal settl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memory institutions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The delegation was welcomed by the director of the Archive, Mr. Miroslav Urbánek, with Mr. Lubomír Augustín, Head of Office and Kamil Nedvědký, First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The delegation first visited the premises and workplaces of the Archives department in Prague-Braník. Here, the managers presented samples of archival materials and gave an expert presentat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the former Czechoslovak communist intelligence service with a focus on the Far East and China. Subsequently, they visited the digitization and restoration workplace, where the employees showed them examples of damaged archives and their repairs, the digitization system and other work with scanned copies.

The Taiwanese delegation was interested i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Archive, processing and making available the materials of the former communist security forces. The legislative and economic framework and other legislative processes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Archive carries out its activities were presente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working meeting concern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activities of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Platform of European Memory and Conscience.



2024.09.06 安全部門檔案局官網發布之拜會紀錄

ÚSTR NAVŠTÍVIL MINISTR TCHAJWANSKÉ VLÁDY



(6. 9. 2024) – V pátek 6. září 2024 navštívil Ústav pro studium totalitních režimů Lin Ming-hsin, ministr bez portfeje tchajwanské vlády doprovázený pětičlennou delegací. Hlavním cílem návštěvy bylo setkání s vedením ústavu a sdílení zkušeností v oblasti transformačních procesů či zřizování paměťových institucí v nově vznikající demokracii.

Setkání proběhlo přímo v prostorách Archivu bezpečnostních složek v Praze-Braniku. Zahraniční návštěvu přivítali spolu s **Ladislavem Kudrnou**, ředitelem Ústavu pro studium totalitních režimů a **Kamilem Nedvědickým**, 1. náměstkem ředitele také zástupci vedení Archivu bezpečnostních složek

„Vzhledem k dlouhodobé absenci specializovaného oddělení pro lidská práva v rámci exekutivy byla u nás implementace politiky lidských práv ztížena,“ prohlásil na úvod Lin Ming-hsin a dodal, že Oddělení pro lidská práva a transformační spravedlnost Výkonného dvora Yuan bylo zřízeno až v roce 2022. Česká republika si při řešení historie autoritářské vlády sice nezvolila cestu ustanovení jednoho stálého specializovaného nezávislého orgánu, který by koordinoval celkovou politiku týkající se transformační spravedlnosti, což ale neznamená, že by tchajwanský model musel být méně stabilní, neboť tzv. transformační spravedlnost zajišťuje taktéž koordinaci a dohled nad zpřístupňováním politických archivů, identifikaci a nakládáním s pachateli. Vlastní koncepce zahraničních kolegů se v mnoha aspektech podobá koncepci činnosti českých paměťových institucí včetně Ústavu pro studium totalitních režimů.





Během téměř dvouhodinového setkání spojeného s prohlídkou prostor Archivu bezpečnostních složek se vedle řady dalších témat hovořilo například o roli široké veřejnosti ve sporech ohledně hodnotových pohledů na historii, strategii zkoumání historie nacistické a komunistické éry a o příkladech vyřešených případů na základě domácích archivních zdrojů. „Ústav pro studium totalitních režimů je největší paměťová instituce v České republice. Naši historikové a odborníci pravidelně vystupují na mezinárodních kolokviích, jsou členy řady vládních i nevládních organizací a často se podílejí na formování nových přístupů v oblasti zkoumání historie,“ prohlásil **Ladislav Kudrna**, ředitel ústavu, který prosazuje intenzivní zahraniční spolupráci nejen na evropské úrovni od roku 2022, kdy se ujal pozice šéfa instituce.

Podle Kudrny má být zkoumání a napravování zločinů totality přirozeným znakem vyspělých demokracií, ale současně by se nemělo zapomínat na zdůrazňování významu českých osobností v evropském kontextu. „V rámci setkání se nám navíc podařilo dohodnout další spolupráci a sdílení zkušeností z poznávání nedávné minulosti,“ doplnil **Kamil Nedvědický**.

Ladislav Kudrna na závěr setkání rovněž sdělil, že málokdo ví, že obě země mají společnou minulost. Zmínil, že jako historik napsal několik knih a studií o Češích a Slovácích, kteří bojovali v první válce ve Vietnamu jako příslušníci francouzské cizinecké legie. Po porážce generalissima Čankajška v čínské občanské válce naši legionáři přes území Indočíny doprovázeli ustupující čínské vojáky směřující na Tchaj-wan.

2024.09.06 極權政權研究中心官網發布之拜會紀錄

第三節 拜會「戰後」

- 拜會時間：113 年 9 月 6 日 星期五 下午 2:00
- 接待人：總裁兼創辦人 Mikulas Kroupa、董事兼區域發展處處長 Martin Kroupa、國際合作處處長 Marie Janouskova、國際合作處東歐及亞洲區域專員 Jan Blazek、國際合作處拉丁美洲區域專員 Eva Kubatova、教育處處長 Dominika Kopcikova、教育方法論負責人 Tomas Spacil
- 機構簡介

「戰後」(Post Bellum)是 2001 年由一群歷史學家和記者成立的非政府組織，旨在提高公眾對 20 世紀極權統治歷史的認識。該組織與極權主義政權研究中心和捷克廣播電臺合作，創建了名為「國家記憶」(Memory of Nations)的口述歷史資料庫，是歐洲最大的線上口述歷史證言資料庫，記錄了「退伍軍人、大屠殺倖存者、政治犯以及共產黨成員、秘密警察和人民民兵」的故事。此外，該組織每年頒發「國家記憶獎」以表彰勇敢反抗極權主義政權的人；並每年舉辦「為國家記憶而跑」長跑活動，紀念極權政權下的犧牲者。

- 拜會紀要

一、建置「國家記憶資料庫」，積極投入歷史教育工作

「戰後」認為臺灣和捷克同樣經歷極權統治，擁有相似的歷史經驗，適合開展合作，他們很樂意與臺灣分享該組織運作 20 年的經驗。「戰後」創建了名為「國家記憶」的資料庫，紀錄極權統治下人民的口述歷史記憶，該資料庫的特點是全面開放閱覽，內容涵蓋整個 20 世紀，已有 1 萬 5 千多筆故事，是歐洲最大、也是世界第三大的線上口述歷史證言資料庫。該組織不只蒐集捷克的口述歷史證言，也蒐集其他共 38 個國家的口述歷史證言，因此，該組織在其他國家也有工作者，協助蒐集當地證言。他們也提到進行口述歷史訪談 20 年來感受上的變化，20 年前曾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共產主義政權的人較多還健在，且多集中在政治受難者相關協會，該組織容易採訪到許多豐富的故事；20 年後的現在則較難尋找適合的受訪者。至於「為什麼要聽這些人們的故事？」，他們認為聆聽上一世代的證言對年輕世代來說是很好的教育方式。

目前「戰後」有很多計畫正在進行，除了口述歷史證言蒐集計畫，還有主要針對小學及中學學生的教育計畫。該組織 12 年前開始推動教育工作，例如以「我們鄰居的故事」為主題，讓 6 個學生（年齡層通常為 12-17 歲）為 1 組，由學校教師及「戰後」協調人員陪伴，去採訪曾經歷極權主義的年長者的故事，並與同學分享訪談成果；所製作完成的成品，亦可提供作為教材運用。「戰後」會主動尋求有合作意願的學校或地方政府，提供整套的服務計畫及教師所需的額外資助。此外，他們也接受學校的邀請，前往講授歷史課程，或藉由工作坊、戲劇、角色扮演等各種能「親身體驗」的方式帶領學童了解歷史。整體而言，在教育推廣工作上，與教師的合作是最關鍵的部份。

至於民眾、學生家長或學校會不會排斥「戰後」的口述歷史訪談或教育計畫，調查發現，社會大眾非常支持「國家記憶」活動，尤其近來假訊息有造成社會分裂情形，「國家記憶」正可保護社會避免受假訊息影響。學生也非常樂於學習極權政權統治的歷史，因為捷克的歷史教育多著重古代史，學校老師因擔心政治敏感，也不太願意教導二戰以後的歷史，因此許多年輕人希望學習更多 20 世紀的歷史，也很少有家長反對小孩被教導這段歷史。該組織相信，把歷史化身為「人的故事」，更能達到教育的目的。

二、尋求各方資助，爭取與政府機關合作機會

有關「戰後」的規模與資金來源，目前工作人員有 317 人，營運的資金中 50% 來自募款（有許多每月定期定額捐款的捐款者），另 50% 來自捷克政府和歐盟的資助。國際性計畫的資金來源有不同方式，可由合作國家的政府挹注經費或由私人贊助，亦有些在非民主國家進行的計畫是由捷克外交部提供資金。目前該組織每年預算約 1.5 億捷克克朗，其中 1 億元用於教育推廣和媒體計畫，另 5 千萬元專門用於支持烏克蘭戰爭。他們表示，「戰後」作為一個長期關注極權主義暴力的組織，無法對俄羅斯的侵略袖手旁觀，所以於 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開始即致力協助為烏克蘭募款，目前該組織已累計捐助 4 億捷克克朗金援烏克蘭。

有關來自政府資助的部分，主要是由「戰後」主動提出計畫，分別向不同的機關申請補助（類似我國補助案）。在捷克有個非政府組織協會，可以讓民間團體互相交流向政府申請經費的經驗。他們也提到，如果能夠由某個機關統合協調

補助民間團體項目的話，行政上會便利許多，就不用分別向不同政府單位申請。捷克內政部秘書處有個協調機構，會決定每年各機關補助計畫的經費預算，但無法實際核定個別計畫。而「戰後」在提送服務計畫時，通常會敘明該計畫所需經費有 50%來自組織本身的募款，其餘額度才由政府補助，這是他們跟其他民間團體不同的一項優勢。

捷克的民間團體很少有機會直接參與政府決策，但可以提供諮詢意見，例如有個由 40 個教育領域的民間團體組成的平臺，會提供教育相關意見給教育部作為立法參考。近年來捷克相當依靠民間團體發展歷史教材；民間團體在和政府機關合作、接受補助時，並不會擔心被外界質疑立場不公正，反而是政府機關怕被外界質疑提供資金給民間團體來協助政府宣傳。該組織現在已有不小的規模，是捷克極權政權研究中心的可靠夥伴，也經常向安全部門檔案局調閱檔案，並從檔案中找到秘密警察詢問其受訪意願。

至於「戰後」所做成的影音紀錄如何存放，該組織表示影音紀錄的檔案資料庫委由可信賴的民間資訊廠商維護保存，採異地備份方式管理。另外，紙本類檔案的數位化會由安全部門檔案局負責；影音類檔案每星期會於捷克國家廣播電視臺的節目播出，該電視臺亦會儲存檔案。

三、兼顧個人資料保護與資訊開放應用

在個資保護部分，歐盟十分重視個人資料保護，因此他們在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時會請受訪者簽定契約，同意受訪內容對外開放。資料庫使用者必須註冊申請，並同意保護所運用的資料，才能使用資料庫；後續使用者個人如何運用這些口述資料，則須自行負責。至於訪談內容是否曾受質疑，目前資料庫約有 1.6 萬則故事，幾乎未發生過對訪談內容正確性的質疑情形，亦從未有當事人出面反駁。在訪談內容製作時，採訪者也會考量採訪內容是否會影響第三人權利，若會，就會避免露出其身份和姓名。同時，也會顧及平衡報導，從不同的面向提供證言內容。當資料內容的露出有可能危及受訪者的人身安全時，也會暫時將資料先從前臺下架，不開放使用。例如有些曾經受訪的個人或團體隨著該國政治情勢變化（如白俄羅斯或緬甸），後來入獄或組織瓦解；若「戰後」無法聯繫到這些受訪者，就會以考量當事人人身安全為優先，將證言內容下架。

四、認為加害者處置工作尚有極大努力空間

「戰後」的訪談對象除了有受害者，也包含秘密警察，但極權體制參與者或協力者通常比較不願受訪，也比較不會說出實情。一般多是在加害者受審判後，才會洽邀訪談。該組織也批評捷克政府在追訴、處置加害者方面做得很不足，他們說明，過往共產黨執政時期，曾有 25 萬人被勞改、很多政治受難者被判刑，至少有數千人是共產黨的參與者或協力者，例如許多有暴力行為的獄卒。由這個人數看來，顯見目前捷克對於加害者的定罪率相當低（據共產黨罪行調查警務局稱，約有 250 人被定罪）。在法庭上，經常因被起訴人自稱「什麼都不記得」、缺乏證據，或是因時間太久遠難以追溯，而獲判無罪。透過記錄體制參與者與協力者的證言，並與政治檔案相互對照，爬梳當時歷史背景，可作為教育推廣素材，讓年輕一代了解為何有些人會服膺於極權主義政權，且現在擁有的自由是前人努力爭取而來，最終目標是要教育出民主世代的積極公民。

五、推動跨國合作，關注臺灣民間經驗

「戰後」有跨國合作業務，多半是與其他國家的民間團體合作，或是採訪流亡政府組織。教導當地記者如何進行採訪，或由該組織直接派員前往採訪。雖然國際合作以歐洲地區居多，但在亞洲也曾有個別合作經驗；他們曾與緬甸的政治犯協會有過為期 2 年的培訓計畫，也曾到韓國參加交流會議或在越南錄製訪談。日前，他們初步調查臺灣可能合作的民間團體，包括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等，也歡迎訪團提供其他適合合作的名單。

● 拜會小結

作為民間團體，「戰後」有龐大的規模與動能，跨年代、跨地域廣泛記錄 20 世紀極權政權統治下的歷史經驗，留下這些見證者的面孔與聲音。他們創建「國家記憶」資料庫並向全世界開放，也推動歷史教育計畫；與學校教師合作，將口述歷史證言轉化為教育素材，為未曾經歷過極權統治的年輕世代提供一個與過去對話的橋梁，激發對於極權主義政權的深刻反思。同時，他們不只聚焦在過去，也致力抵抗現在進行式的極權主義侵害，如發起支援俄烏戰爭的勸募行動，共有高達三分之一的年度經費專門用於幫助烏克蘭。

透過本次拜會，也可以觀察到捷克官方與民間推動轉型正義機關（構）對於處置加害者工作成果的不同看法。捷克官方的共產黨罪行調查警務局稱，針對共產主義政權統治時期安全部門的犯罪行為的起訴率與定罪率將近 100%，至今他們仍積極主動偵查相關案件；而「戰後」則直言，官方在追訴加害者方面做得不足，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臺灣研究一般認為，捷克在除垢、處置加害者方面在歐洲國家中已是相對積極的代表¹⁶，惟透過本次拜會，得以了解其相關工作亦存在侷限之處。

「戰後」強調，臺灣與捷克有相似的歷史經驗，願意與臺灣分享他們的經驗和方法，為未來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訪團返臺後，亦推薦數個致力於記憶臺灣威權統治歷史或進行口述歷史紀錄的臺灣民間團體，提供「戰後」參考。若「戰後」有意願，後續亦可安排與國家人權博物館交流進行口述歷史訪談的經驗。此外，也將視本處辦理的活動內容，適時邀請該組織參與，促進其與臺灣關心人權及轉型正義工作的機關、團體和伙伴們進行交流。



2024.09.06 訪團拜會戰後

¹⁶ 林佳和（2021）〈追究加害人？從轉型正義之法（Lex Transitus）觀察後社會主義國家之捷克與波蘭經驗〉，《黨產研究》7，169-269。

第四節 參訪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雕像、米拉達·霍拉科娃紀念碑、絆腳石、藍儂牆

- 參訪時間：113 年 9 月 1 日 星期日

除了拜會捷克的人權及轉型正義相關機關（構），訪團也參訪與捷克公共空間中與轉型正義精神相關的紀念物，包括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雕像、米拉達·霍拉科娃紀念碑、絆腳石、藍儂牆等。

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雕像（Memorial to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是紀念共產時期（1948-1989）受難者的一組雕塑，位於佩特任山腳下的布拉格小城區。這座紀念雕像揭幕於 2002 年，由當地議會和政治犯聯盟（KPV）出資建造。這座紀念雕像沿階梯展示七個的人形銅像，越往上雕像形象越殘破，身軀逐漸消失，最後僅剩一隻腳掌，象徵政治犯受共產制度迫害。沿著紀念雕像的中心有一個青銅長條，顯示受共產制度迫害的估計人數。



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雕像

位於布拉格的米拉達·霍拉科娃紀念碑(Pomník Milady Horákové),紀念 1950 年被共產黨當局處決的律師兼國家社會主義議員米拉達·霍拉科娃 (Milady Horákové),她是捷克斯洛伐克 1950 年代政治審判史上唯一的女性。此紀念碑設計成法庭上被告的站臺,麥克風上坐著一隻百靈鳥,象徵著自由。站臺上寫著米拉達·霍拉科娃在行刑前的最後一封信中寫下的話:「我輸掉了這場戰鬥,但我帶著榮譽離開。我愛這個國家,我愛這個民族,為他們的福祉而奮鬥。我離開時對你們沒有怨恨。我祝福你們,我祝福你們……。」



米拉達·霍拉科娃紀念碑

絆腳石 (Stolpersteine) 為 1992 年起由德國藝術家岡特·德姆尼希 (Gunter Demnig) 發起的一個藝術項目。「絆腳石」,是長寬各 10 公分的立方體混凝土塊及鐫刻著紀念文字的黃銅板,旨是紀念納粹時期的受難者。絆腳石通常鋪設在受難者生前住所門前的路面上,與普通的鋪路石平齊。目前,已經有超過 90,000 塊絆腳石被鋪設在德國和歐洲的其他國家。捷克布拉格市區亦有許多絆腳石,提醒人們勿忘極權統治對人民生命與尊嚴帶來的傷害。



布拉格的絆腳石

藍儂牆（Lennon Wall）源於 1980 年代，一位藝術家於馬爾他騎士團所屬的牆面上畫了一幅約翰·藍儂（John Lennon）的壁畫，後來越來越多人在該牆面上塗鴉、寫下對共產主義政權的不滿，藍儂牆遂成為反抗極權主義與言論自由的象徵。



藍儂牆

第五節 參訪共產主義博物館

- 參訪時間：113 年 9 月 7 日 星期六 上午 10:00

共產主義博物館位於捷克布拉格，於 2001 年成立，是由一位美籍人士私人出資所設立的博物館。博物館展示 1948 年二月政變到 1989 年天鵝絨革命期間共產主義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包含日常生活、政治、歷史、體育、經濟、教育、藝術、媒體宣傳、人民民兵、軍隊、警察（包括秘密警察）、審查制度、法院、其他鎮壓機構、勞改營等不同情景說明、照片、實物與模擬場景。



共產主義博物館大門



博物館展場入口處的紅星標誌、馬克思塑像及牆上的「DREAM REALITY NIGHTMARE」文字

博物館展場入口處，懸掛了代表共產主義的「紅星」標誌，牆角樹立一個共產主義開創者馬克思的塑像，牆上並寫著「DREAM」、「REALITY」、「NIGHTMARE」(夢想、現實、夢魘)三個字，代表展場裡三個展示主題，分別為「夢想」－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誕生及二月政變；「現實」－共產主義下人們的生活與秘密警察；「夢魘」－軍事審判、勞動營及最後的天鵝絨革命。這三個字同時也意寓著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甫掌握政權時，人民懷著期待與夢想，而後續在政策改革推動和人民生活的現實體驗上，卻出現期待與夢想的落差，最終是一場極權統治的夢魘；這場夢魘也是當前捷克政府推動轉型正義工作中努力記取的教訓，希望歷史不再重演。

博物館佔地近 1,500 平方公尺，透過短片、海報和文物的展示，提供了共產主義時代捷克斯洛伐克生活的不同面向，包括人民日常生活、政治、歷史、體育、經濟、教育、藝術（特別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媒體宣傳、人民民兵、軍隊、警察（包括秘密警察，StB）、審查制度、法院和其他鎮壓機構（包括史達林時代的審判和政治勞改營）；它特別關注從 1948 年二月政變到 1989 年天鵝絨革命期間統治該國的極權主義政權，讓參觀者體驗真實的時代感受。¹⁷

¹⁷ 摘述自共產主義博物館網頁，<https://muzcumkomunismu.cz/en/about/>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第一位總統 Tomáš Garrigue Masaryk，被稱為「祖國之父」



展場所展示捷克斯洛伐克地圖；1993 年捷克與斯洛伐克分為 2 個國家，地圖中右半邊即為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產業豐富，牆面上文字寫著：「奧地利女皇瑪麗亞泰瑞莎曾說過，如果少了捷克這片土地，整個帝國所剩的，僅是貧瘠的奧地利大公國。」(Emperor Maria Theresa once proclaimed that without the Czech lands all that would be left of the empire would be the poor Austria Archduchy.)



共產主義時期的畫作展區，可看出當時運用畫作宣揚共產主義的情形



以此幅畫作為例，畫面是礦工在礦坑裡享用美食，企圖呈現勞工生活美好的一面；畫作左側較明亮處 1 人拿著刀子正在切肉，導覽者表示：「試想，在礦坑的環境裡，處處塵土飛揚，怎麼可能在那裡切肉？」顯見此畫面是脫離現實



這幅畫作呈現共產主義倡議的勞動階級至上；畫面上由「勞工」（第 1 位拿鐵鎚者）帶領工程師（第 2 位穿白袍、拿圓規者）、鐵道工人（第 3 位拿十字鎬者）及各種不同社會階層人員向前邁進；後方山邊的彩虹，代表社會安和樂利與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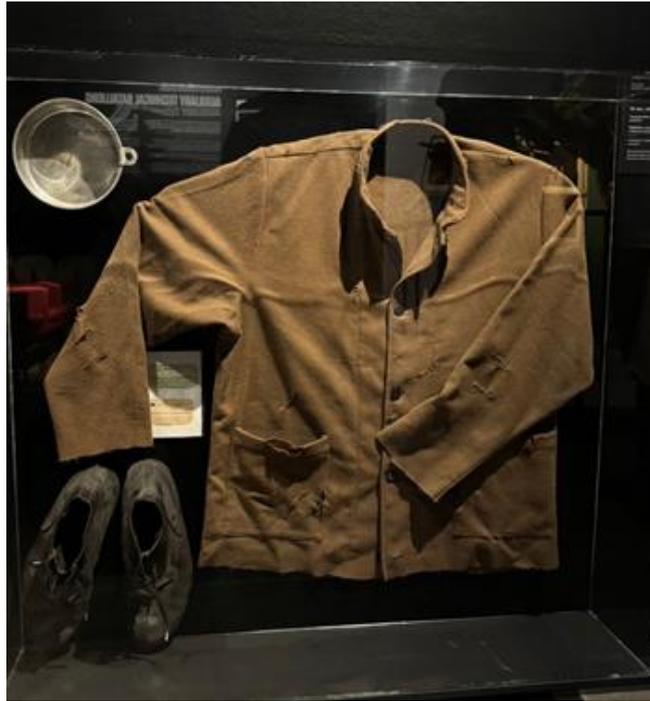
展場展示模擬絞刑臺，牆上玻璃櫥窗內有 1 條絞繩；據導覽者說明，每位受刑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絞繩，在行刑後，絞繩會併同個人檔案歸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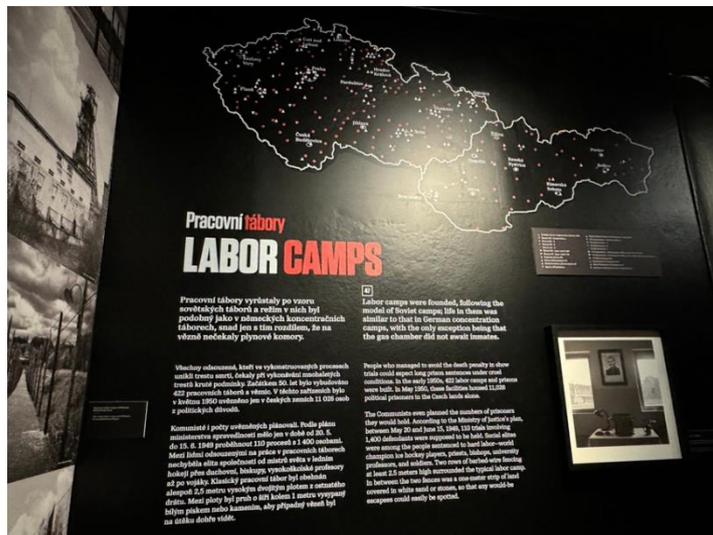
展場中以鳥瞰視角擺設審問室的場景；導覽者說明，審問室地板是白色的，在審問時有時會灑上動物的血，窗戶旁的房間會傳出其他人哭喊的聲音，營造出恐怖的氣氛，增加受審者心理恐懼感



展場內模擬邊境衛哨場景，包括衛兵服裝、通高壓電的鐵絲網圍籬，並播放企圖越境逃亡者奔跑喘息聲、衛兵追趕的斥喝聲和槍聲，讓參觀者體驗邊境緊張的氣氛。導覽者表示：每一個哨點一定是安排 2 位衛兵，可以相互監控，避免另一方逃跑。如果成功阻攔越境者，可以放假 3 天，並獲贈手錶 1 支



展示勞改營工人的服裝與飲食用鋼碗；據導覽者表示，當時每天僅提供每位工人 500cc 的牛奶



50 年代初期，捷克境內修建了 422 座勞改營和監獄，遍布全國各地（地圖上紅點所示）；在 1950 年 5 月，就關押了 11,026 名政治犯，其中不乏社會菁英，包括世界冠軍冰球運動員、牧師、主教、大學教授等。典型的勞改營周圍有兩排至少 2.5 公尺高的帶刺鐵絲網圍欄，兩道圍欄之間有 1 公尺寬，上面鋪著白色沙子或石頭，任何試圖越獄的人都很容易被發現



位於捷克布拉格的史達林紀念碑，落成於 1955 年。紀念碑高 15.5 米，長 22 米，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史達林雕像；但在完工不久後，蘇聯即開始批判史達林，因此，紀念碑於 1962 年即被以炸藥爆破拆除。左圖為展場所展示紀念碑照片，可看到紀念碑最右邊者為史達林，後方帶領工、農、士兵等社會各階層人士前行。右圖最上者為紀念碑作者，最下者則為紀念碑爆破之場景



參訪當日由展覽策展人 Alexandr Koráb（左 1）親自導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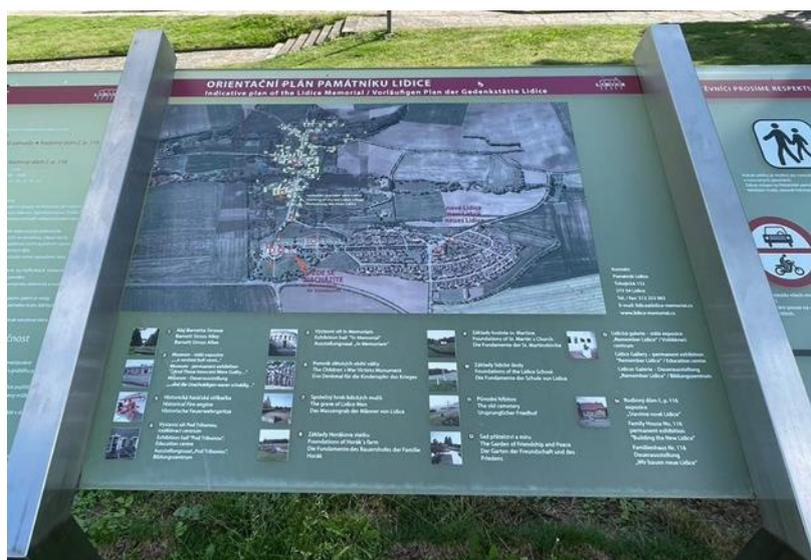
共產主義博物館以不帶批評的方式，透過文字、鏡頭、實物情境、當時的藝術創作來陳述歷史，展示當時政治、社會與人民生活狀況，讓參觀者在觀展過程中，能夠直接感受共產主義極權統治下人民生活及人權受侵害的情形。其中特別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展場中的一些極權統治控制人民的模擬場景，像是訊問室、絞刑臺、邊境通電的鐵絲刺網圍籬、越境逃亡者的喘息聲、衛兵的追趕聲和槍音，讓參觀者如臨其境地感受到強大的壓迫感。這也呼應著在現今推動轉型正義工作上，「記憶」是重要的關鍵元素。

第六節 參訪利迪策紀念館

- 參訪時間：113 年 9 月 7 日 星期六 下午 3:00

利迪策紀念館位於布拉格附近，是為了紀念發生於 1942 年 6 月 10 日納粹屠殺利迪策村民的事件而建立的歷史紀念地。事件的緣由，是因為當時納粹高級官員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遭暗殺，據傳暗殺者是來自利迪策村（另一說法是利迪策村被懷疑掩護暗殺者），納粹因此展開報復行動，將村中成年人全部被槍決或送往毒氣室屠殺，約 340 人遇難（包括 88 名兒童），另有一些孩童被送往集中營或由德國人領養；此外，整個村莊被焚毀，村裡所有動物亦遭宰殺；此一事件被稱為「利迪策慘案」。

利迪策紀念館於 1955 年在原來利迪策村所在地建立（利迪策村則於附近另一處重建），旨在銘記這一滅村慘案，並弘揚和平與人權的價值。雖名為「紀念館」，實際上是一處保留利迪策村莊的園區；園區內有一座博物館，內有圖片、影片和實物展示；園區的草地上保留部分存留的廢墟遺跡，另有一些雕像和紀念碑，其中最著名的是「利迪策兒童雕像」，雕塑了 82 名遇害兒童的形象。為了悼念利迪策慘案中死難的兒童，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Women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在 1949 年將每年 6 月 1 日定為國際兒童節（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



利迪策紀念館區標示說明，圖內有當時村莊裡相關設施及道路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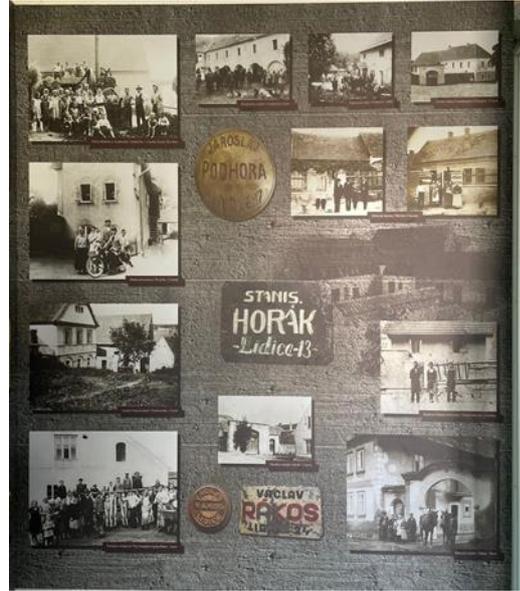
園區範圍涵蓋當時利迪策村莊的所在地，保留部分遺址，另設立博物館及展示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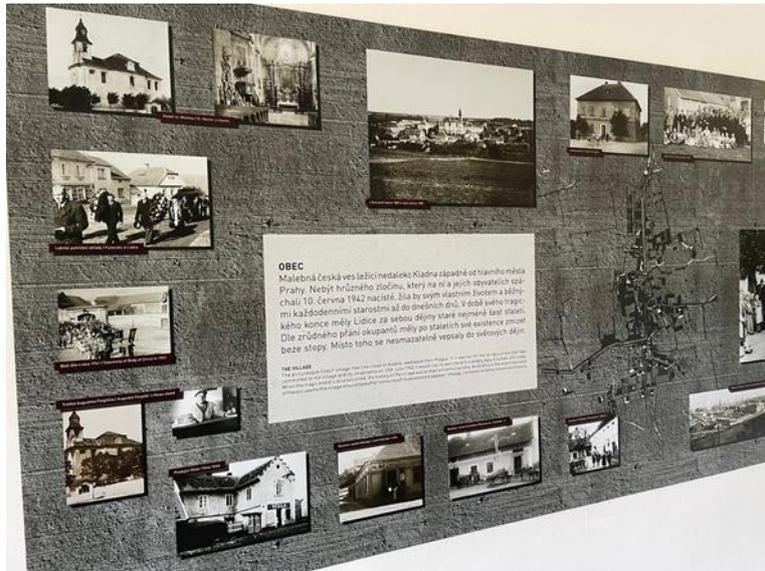
園區內將當時村莊裡的重要設施，如學校和教堂的位置加以標示，並樹立說明牌



在園區中發現一處「絆腳石」標記，上方的石塊代表此處原本有一建築物



博物館內展示了利迪策建築和村民生活老照片，以及當時學校內的設備物品和文件



圖中的說明文字寫著：（利迪策）風景如畫的捷克村莊，位於首都布拉格以西的克拉德諾附近。如果不是 1942 年 6 月 10 日納粹對這個村莊和居民犯下的可怕罪行，直到今天，它都會過著自己的平凡無憂的日常生活。在悲劇發生之前，它已經至少有 6 個世紀的歷史了；根據占領者的想法，希望這個村莊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是，相反的，它們反而不可磨滅地被寫進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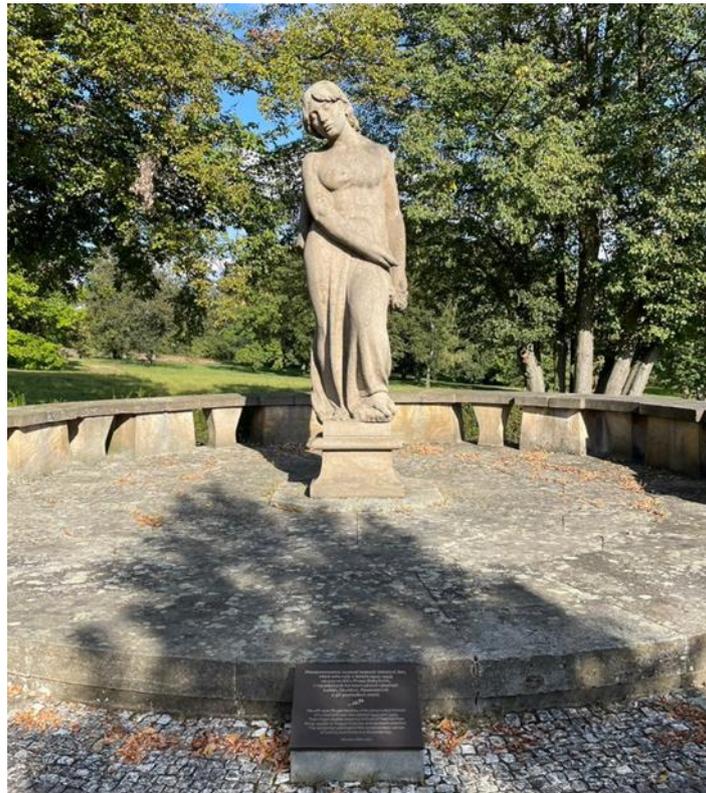
紀念館外壁的浮雕，描述村民被納粹士兵脅迫集中、婦女與小孩被分別隔離的場景



園區內最著名的雕像，內有 82 名孩童，每個人臉上都充滿恐懼與無助的表情



這是一墓園型式的紀念處，前方紀念碑上寫著：「1942年6月10日173名利迪策男子被處決，長眠於此」



雕像為紀念利迪策慘案中死難的婦女，碑文上寫著：「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在1942年至1945年間死去的60名利迪策婦女的命運，他們在納粹部隊和集中營中喪生」



園區中樹立許多紀念性的雕像和紀念碑。上方左圖雕像名為「母親和孩子」，右圖名為「哭泣的女人」，呈現出事件中女性和孩童的無奈。

若在不知道利迪策慘案這個歷史事件前來到這個園區，會以為這裡是類似高爾夫球場的休閒運動公園。但是在實際參訪過博物館，觀看館內展示的照片、物品和播放的影片，以及園區內保留的遺址、樹立的雕像和紀念碑之後，便能深刻感受當時村民經歷的恐怖情景，由此可見歷史遺址的保存所能發揮的教育功能與

意義。

捷克政府願意保留這一處原址，並另尋他處重建利迪策村，一方面顧及倖存村民（尤其是當時的孩童）的照顧與心理療癒，另一方面也表現對於保存歷史記憶的重視。園區裡的展示以保留原址面貌為原則，但由於當時村莊幾乎被夷為平地，鮮有殘留的遺構，因此，只能標示原建物位置。另設置的雕像和紀念碑文，多以事實陳述方式，指出實際受害的人是誰？有多少人遇難？受難的景象和情景等，都一再地加深參觀者對於「避免再犯」的警惕。如同博物館內展示說明所述，報復者原本想要讓利迪策村在歷史上消失，但是它反而在歷史上變得不可抹滅。

第四章 心得及建議

本次考察在駐波蘭代表處及駐捷克代表處協助下，順利拜會波蘭與捷克官方推動轉型正義相關機關，如波蘭的國家記憶研究院、捷克的共產黨罪行調查警務局、安全部門檔案局與極權政權研究中心，瞭解官方推動轉型正義機制的運作；此外，透過拜會區域性非政府組織，如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瞭解歐洲如何組成跨國網絡，將極權歷史記憶轉化為社會教育素材；最後，也拜會波蘭的民間團體 KARTA 基金會與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捷克的民間團體「戰後」，瞭解民間如何投入人權及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動，以及對於該國官方政策的建言。

本次考察過程，波蘭與捷克相關機關（構）均樂於提供相關協助，除獲得許多建設性之回饋，訪團也分享臺灣民主化及轉型正義推動經驗，透過交流實質增進我國與波蘭、捷克的雙邊關係，奠定臺灣以「人權立國」之形象，為未來長遠合作關係奠定基礎。以下綜整本次考察波蘭與捷克人權及轉型正義相關機關（構）之觀察與心得，提出可供我國未來精進轉型正義工作推動之參考建議，並提供後續與波蘭、捷克拜會機關之合作交流建議。

第一節 汲取歐洲經驗精進轉型正義推動方向

一、政治檔案完整徵集與開放，是轉型正義工作推動的基石

無論在波蘭或是捷克，政治檔案都是該國轉型正義工作推動的基石。波蘭由國家記憶研究院作為統籌檔案徵集的機關，主要徵集波蘭共產時期的軍、警、情治檔案，年代範圍涵蓋 1944 至 1990 年，除了政府部門的檔案，研究院也會徵集私人的檔案，或是向進行歷史記憶研究的國內外民間機構徵集檔案，再針對這些檔案進行研究、運用。捷克則由安全部門檔案局負責檔案的徵集與典藏，主要徵集捷克納粹統治及共產黨統治時期安全部門的檔案，年代範圍涵蓋 1939 至 1990 年，再由極權政權研究中心針對這些檔案進行研究，共產黨罪行調查警務局也會運用這些檔案作為起訴加害者的證據。

在檔案瀏覽與使用部分，波蘭的研究者、記者、國家記憶研究院的員工、有獲得授權的機關（部會、警察部門、總統府），以及部分個人（受害者本人，或

如果本人已經過世，家人可以申請）可以調閱國家記憶研究所藏的檔案，波蘭公民也都可以向研究院提出申請，瀏覽過去的特務或是現在的高官的檔案。除了較為隱私的資訊（疾病、性傾向、宗教信仰）會隱蔽處理，其餘資訊都會提供。捷克則採最大程度開放方式對外提供應用，其所藏檔案幾乎全數開放，且對個人隱私不加遮掩。波蘭與捷克都不會向申請者提供檔案的研究分析，也不會評斷檔案內容的真實性；他們認為如何判別內容的真偽、如何發布運用這些資料，是申請人要自行承擔的責任。

臺灣的政治檔案徵集工作曾遭遇許多阻力。過往國安情治機關經常以「國家安全」為由，不願配合徵集，或遮蔽許多關鍵資訊；直到《政治檔案條例》修正新制於 2024 年 2 月 28 日實施後，除擴大徵集檔案，也加速檔案解密，有望提升檔案典藏完整度。目前所徵集的政治檔案，已有效運用於國家不法行為的平復、權利回復及相關研究工作。未來在政治檔案徵集工作上，仍需整體盤點各機關於威權統治時期所負職責事項，就涉及威權體制建立、運作與協力推動等面向之相關檔案進行徵集，讓檔案中的歷史圖像更加完整。

至於在開放應用方面，相較於波蘭與捷克，臺灣對於檔案當事人保障程度較高；對於檔案中載有被監控當事人的高度隱私，如家庭關係、伴侶關係、性別關係或私領域監譯紀錄等，由於這些內容是過去國家以不當手段取得的，檔案局會主動通知檔案當事人優先近用檔案；當事人並有附卷權及對高度個人隱私紀錄的拒絕開放權，以避免當事人的隱私再度受到侵害。

二、採取人事清查（除垢）或司法起訴方式對威權體制參與者或協力者究責

對過去威權體制參與者或協力者究責，是波蘭、捷克等國與臺灣在轉型正義推動政策方面最大的不同之處。現行臺灣轉型正義，仍被垢病「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在波蘭與捷克則有人事清查（除垢）、司法起訴等方式，讓威權體制參與者或協力者為過去的違法行為負責，同時，禁止其再任相關公職，以將其影響力排除於公領域之外，從而鞏固民主發展。

在公部門人事清查（除垢）方面，波蘭所有在 1972 年以前出生的人，如果想要擔任公職，都要提出自己沒有在共產時代和秘密警察合作的聲明，並經國家記憶研究院調查其證詞是否屬實，亦會經所謂的「除垢法庭」做出裁決。捷克則

規定曾為共產黨員者，不得於特定公部門服務，員工皆須提交安全檢查證明，以自證並非共產黨員。

在司法起訴方面，波蘭與捷克的交流人員說明，他們所追訴的是以當時的法律來說亦屬非法的行為，例如濫用職權、刑求、謀殺等，即使在共產黨統治時期也是違反憲法及國際公約的罪行，而根據法律規定，追訴過去極權政權的犯行沒有追訴期時效的問題。不過波蘭與捷克都坦言，在加害者究責的部分，如何與時間賽跑，加速追訴的速度與數量，是至今仍需要持續努力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波蘭的人權團體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指出，在除垢的做法上，即使有檔案作為真相調查的基礎，但檔案內容往往摻雜真實與虛構訊息；如何檢驗檔案所載內容的真實性，讓當事人有為自己辯護的空間，是人事清查過程需特別注意的地方。

三、前威權體制參與者或協力者在政壇仍有影響力，成為推動轉型正義潛在阻力

然而，儘管波蘭與捷克各有究責過去威權體制參與者或協力者的方式，但他們也舉出一些案例，表示部分前威權體制成員至今仍在政壇有影響力。波蘭的民間機構表示，由於該國民主轉型過程為統治者與反對運動者採和平協商方式，波蘭原執政黨雖然解散，但其成員並未退出政治舞臺，而是投身進入不同的新政黨，仍然在波蘭政壇發揮著重要影響力。甚至，這些勢力還在國會阻礙波蘭轉型正義的推動，反對國家記憶研究院的存在。而在捷克，即使有著更嚴格的人事除垢與司法起訴手段，也很難完全撤換所有曾與共產黨有過合作的人，有些人至今仍然握有權力，對國家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力，這些勢力也曾在憲法法院上訴，質疑極權政權研究中心及安全部門檔案局的合法性。

前威權勢力的存在也會反映到轉型正義相關工作的推動困難，如波蘭訂定清除共產時期威權象徵的專法，推展初期雖有成效，後期則仍受政治力影響，有些受共產勢力影響較深的地方政府不願配合，甚至有把已經去掉的共產象徵回復到公共空間的情況存在。捷克也有提到，安全部門檔案局在成立之初向相關機關徵集檔案時，一開始也曾遭遇徵集不順的情況，因為共產時期的參與者或協力者仍存在於機關之中。

臺灣推動轉型正義工作的處境也有類似狀況。由於臺灣民主轉型過程相對較少流血衝突，被稱為「寧靜革命」；過去威權統治時期所建立的黨國遺緒仍然存在，造成政治檔案徵集、威權象徵處置、加害者究責等轉型正義任務，無論在法制的建立或工作推動上均逢較大阻力。

四、民間力量應予重視，公私協力擴大參與

波蘭與捷克的官方機關均會偶爾諮詢民間團體意見，但並無正式法定機制將民間意見納入決策。本次參訪的民間機構對於能夠參與政府決策過程多有期盼，並且對於目前政府推動轉型正義的做法與成效，亦有不同的意見。然而，即使民間團體參與政策的機會不多，但其自身仍致力於轉型正義教育的推動，並且有相當具體成果，甚且能夠成為支持政府推動相關教育的資源。

臺灣的轉型正義工作初始即啟動於民間；民間的訴求與策勵，往往是政府政策推動上的重要參考。目前除了在本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有民間委員代表外，六部會所屬轉型正義業務皆有學者專家、公民團體或受害者及其家屬代表參與其中。未來仍應考量建立公私協力的適當機制，廣納各方量能與意見，讓各項推動工作更臻完備。

五、透過多元形式的歷史記憶空間素材進行教育推廣，深化民主人權意象

此行除了拜會波蘭與捷克人權及轉型正義相關機關（構），訪團也利用拜會行程空檔參訪具轉型正義教育推廣意義之博物館、紀念館與公共藝術地景。步行於城市公共空間，可深刻感受布拉格及華沙兩座城市對於歷史記憶的重視，地上偶爾出現絆腳石，標示著曾居住於此地的某人在納粹時期受害；牆上也不時會有標示牌，描述這個地方曾發生什麼侵害人權的歷史事件；街邊、廣場的紀念碑，則透過多種樣式的雕塑，時時提醒極權統治下，人民經歷怎樣的犧牲。波蘭與捷克不但不怕面對自己國家黑暗、困難的過去，更致力於將公共空間轉化為歷史記憶的拼圖，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連結，這也是臺灣不義遺址保存與活化應努力的方向。

而教育推廣可以說是此次拜會的所有機關（構）共同致力的目標，無論是官方機關、國際網絡或民間團體，都發展出各自的方式，如展覽、出版品、研討會、

教材、口述歷史、遊戲、影展、培植教師社群等多元形式，讓民眾（尤其是未經歷過極權統治的年輕世代）認識極權統治歷史。

六、從轉型正義連結當代極權主義威脅議題，重視年輕世代歷史教育

轉型正義的目的除了縫補社會的歷史傷痕，更重要的是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教訓，確保「不再重蹈覆轍」(Never Again)，並透過捍衛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提升對威權主義威脅的免疫力。

在本次前往波蘭與捷克的考察過程中，可深刻感受到俄烏戰爭對歐洲所帶來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俄烏戰爭讓許多歐洲國家回顧自身從納粹統治到共產統治的歷史經驗，從許多機關、組織的分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當前的局勢不僅加深了歐洲各國對極權主義威脅的警覺，認識歷史上極權政權的壓迫也變得更加重要。極權主義如何侵害基本人權，又如何對社會帶來不可挽回的傷害，透過理解並反思這些歷史經驗，社會得以提高免疫力，防範當代極權主義的侵害。因此，波蘭與捷克的民間機構特別關注年輕世代的歷史教育工作，並且運用多元的素材和媒體工具，包括口述訪談的影音紀錄、網路遊戲、社群活動等，讓年輕世代對於極權主義歷史有深刻的認識。

七、活化運用促轉基金，支持轉型正義相關工作所需

捷克目前正規劃將加害者的不法財產，轉化為賠償及推動轉型正義相關工作的基金，希望將被起訴人承認罪行並經法庭批准後所沒收之不法所得，成立「基金會」，並將這些沒收之金錢用以賠償過去被強迫驅逐出境、或被強迫離職的人，或是用以資助推動「記憶」的官方機關與民間機構。

我國促進轉型正義基金（簡稱促轉基金）的設置與運用已參採類似概念；促轉基金主要來源為不當黨產，依法應作為推動轉型正義、人權教育、長期照顧、社會福利政策及轉型正義相關文化事務支出使用。目前促轉基金已挹注部分機關推動轉型正義工作所需；對於促轉基金的活化與運用，仍應有較長遠、較廣泛的規劃，以發揮其預期的法定效益。

八、臺灣政治暴力受難者創傷療癒模式不落人後

此次考察，訪團觀察到波蘭與捷克的轉型正義工作，皆未涵蓋政治暴力受難者創傷療癒的面向；即使這些歷史創傷至今依然影響著人們，但並沒有特別受到正視、成為官方推動政策之一。而臺灣在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上，比波蘭、捷克等國更加重視；由衛生福利部主責進行整體性的政治暴力受難者照顧療癒規劃。雖然這項工作任務還在發展初期階段，但如能持續深化、精進，將來可作為我國推動轉型正義工作之特殊經驗，與國際分享，接軌國際間新興之轉型正義工作方法。

第二節 以民主人權價值作為外交軟實力

通過正式拜會和交流活動，實質增進我國與波蘭和捷克的外交關係。本次拜訪的幾個跨國性民間組織，其在全權及轉型正義的教育推廣與鞏固民主發展等方面的推動，有許多值得參採之處，例如，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關注到各國人民的歷史經驗不同，透過跨國歷史經驗的交流，有助於讓歷史真相的拼圖更加完整；歐洲記憶與良知平臺以多元的型式發展人權教育素材；KARTA 致力於民間資料的蒐集與保存，補足了官方檔案的空缺；捷克的「戰後」建立了口述歷史資料庫，以聲音影像讓歷史教育素材更豐富化。由此可見，民間的動能與力量，是全權及轉型正義工作推動上不可或缺的資源。

除了借鏡他國經驗，探詢未來彼此的交流合作之可能性，亦為本次考察行程的重要目的之一。本次拜會波蘭與捷克人權及轉型正義相關機關（構），許多單位均展現與我國持續進行合作交流的積極意願，並表示希望本次交流是未來長遠合作關係的開端。近年的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都會舉辦與人權議題相關的國際研討會；2022 年是「平等法的國際視野與立法展望」；2023 年是「人權影響評估的國際視野與在地實踐」；2024 年是「人權教育監測與評估機制的國際視野與在地實踐」；明（2025）年則預定以「轉型正義的國際經驗與在地實踐」為主題。藉由本次拜會行程，我們也邀請波蘭的「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捷克的「戰後」等組織，參與 2025 年預定舉辦的人權日國際研討會，與臺灣學界分享自身經驗，對方皆已答應我方邀請。

歐洲記憶與團結網絡表示很樂意用各種形式和臺灣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後續亦可再安排與我國透過線上會議或工作坊交流年輕世代的轉型正義歷史教育議題；對方於座談時提及，2025年6月該組織將在芬蘭赫爾辛基召開一場會議，主題是關於歐洲共同記憶，也邀請臺灣參加，並認為雙方可多參與彼此所舉辦活動，深化雙邊互動關係。

捷克的「戰後」於拜會時亦展現積極合作意願，並表示已初步調查臺灣可能合作的民間團體，希望與臺灣就該組織的「國家記憶」(Memory of Nations)專案進行合作，進一步交流口述歷史證言蒐集與教育推廣經驗。波蘭的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在拜會時對臺灣威權時期的相關影音記錄展現興趣，也盼後續可與我國針對影音檔案進行交流，甚至可結合臺灣、烏克蘭、波蘭三方一起合作，舉辦人權影展。

針對已提出較具體合作需求的組織，本院已函請較具轉型正義國際交流合作及教育推廣經驗的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請其評估後續合作做法，擬具整體性說明，俾供充分理解臺灣威權統治時期相關典藏、研究、展示及教育推廣情形。通過本次拜會與交流活動，我國以民主、人權價值作為外交關係的軟實力，促進雙邊相互了解，有助於在政策制定和實務推動上獲取靈感與支持。此外，也進一步鞏固彼此在民主價值上的共同基礎，並深化對方對我國在相關領域努力的認識與肯定。未來，我們將透過持續合作，建構緊密的國際夥伴關係。